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2009年8月

# 积极消费： 释放中国的消费潜能



##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MGI) 成立于1990年, 是麦肯锡公司的经济研究部门。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使命是帮助企业及政府领导人形成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深刻认识, 提供事实依据, 针对关键管理和政策问题进行决策。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将经济和管理两大主题相结合。通过将两者加以结合,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得以从微观经济入手, 分析全球经济的广泛趋势。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已将该“从微观到宏观”的方法运用到超过15个国家、28个行业的研究项目当中, 项目课题包括生产效率、全球经济一体化、离岸外包、资本市场、医疗卫生、能源、人口及消费需求。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工作由麦肯锡旧金山、华盛顿、伦敦、布鲁塞尔和上海分公司的全职研究员负责开展。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项目小组还包括麦肯锡全球各分公司的咨询顾问, 并由麦肯锡行业和管理专家组成的网络以及麦肯锡全球董事提供支持。此外,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项目小组还邀请顶尖的经济学家, 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政策专家以项目顾问的身份参与研究院的项目。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项目由麦肯锡公司提供资金, 不受任何企业、政府部门或其他机构的委托。欲了解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更多信息及获得研究院发表的报告副本, 请访问[www.mckinsey.com/mgi](http://www.mckinsey.com/mgi)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2009年8月

# 积极消费： 释放中国的消费潜能

华强森  
吕万  
Richard Dobbs  
Adam Eichner  
倪戴夫  
罗凯恩

## 前言

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三大消费市场。然而,由于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依赖于以工业投资和出口为主的增长模式,个人消费在中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明显偏低。早在全球金融危机席卷中国、其主要出口市场需求下滑对中国带来负面影响之前,中国政府领导人就已经制定了调整经济结构、提高消费占比的新目标。如果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能够推动GDP、就业和收入的增长,同时还将加强中国经济抵御海外风险的能力。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和麦肯锡中国分公司对可以提高消费占比的最重要的政策杠杆进行了分析,希望能为当下所展开的关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讨论提供参考和借鉴。

麦肯锡上海分公司的副董事吕万是本次项目的负责人。项目小组由罗凯恩领导,成员包括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员Adam Eichner、倪戴夫和上海分公司顾问卓蓓。

在评估消费基础设施改善所带来的影响时,项目小组包括了由另一个麦肯锡团队所完成的研究成果,这个团队的成员有安宏宇、陈有钢、韩峰、黄威、黄韬、廖文侃、娄伊琳、彭壮壮和戎莉莉。麦肯锡上海分公司的同事表高敦、王颐、张业泓以及新加坡的David Skilling都提供了各自宝贵的建议和见解。

我们还要感谢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建模小组的高进、胡杨梅、李秀军和梅松,他们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研究基础;感谢麦肯锡北美知识中心的Vivien Singer,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资深编辑Janet Bush,王磊智和Rebeca Robboy在外部沟通方面的建议,以及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驻上海的行政助理张洁琦为项目小组提供的后勤支持。

我们要特别感谢外部专家团队极大的丰富了本次项目的研究,他们包括瑞银集团首席经济学家Jonathan Anderson、布鲁金斯研究学院的Martin Bailly教授、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处的David Dollar、Ardo Hansson和Louis Kuijs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Laura Tyson教授。

这个项目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帮助全球领袖了解塑造全球经济的力量、提高公司业绩、制定更好的国内和国际政策工作的一部分。和所有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一样,我们希望强调这一项目是独立客观的、没有任何方式,受任何公司、政府或其他机构的委托。

Richard Dobbs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总监

麦肯锡公司资深董事

首尔

Lenny Mendonca

麦肯锡全球知识总监

旧金山

华强森

麦肯锡公司资深董事

上海

2009年8月



# 目录

摘要	8
1. 中国消费低于其财富水平	15
2. 中国为何消费不足	21
3. 刺激消费：推行三大政策"组合拳"	29
4. 结论	51
技术附录	52
参考文献	71

## 摘要

中国政府最高领导层意识到，迄今一直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必须改变。中国投资导向型的增长模式使得经济向工业倾斜，并且造成企业投资成本过低，这导致了用于过剩产能的低效投资。而对出口的依赖使得中国遭受主要出口市场经济衰退的拖累。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在全球的不断蔓延，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也不断受到新的挑战，这也更加明确了中国经济向消费拉动模式转变的方向。

2007年3月，中国总理温家宝指出，中国经济存在“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此番讲话出乎外界专家的预料。实际上，温总理和其他负责中国经济的领导人最近已经将促进国内消费作为保持经济长期内可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柱——这一战略性的转变将可能对中国本身以及全球经济都带来深远的影响。

鉴于这个新的政策重点，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即开展了此项研究，分析导致中国消费占比过低的主要原因，并找出未来15年中国可以采取的政策举措来调整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除了出台大规模的短期经济刺激计划来应对当前的危机，中国政府同时还在多个领域进行了改革，包括医疗体系、教育机制、养老金制度。本报告旨在量化这一系列举措在充分落实的前提下，将对当前个人消费在GDP中占比过低的现状带来怎样的影响。

### 到2025年，中国可以将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到50%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个人消费<sup>1</sup>占GDP的比重有可能从2005年的36%提高到2025年的45-50%，比39%的基准趋势预测高出6至11个百分点（图E1）。通过量化可以提高中国消费占比的各项政策举措，本次研究希望为中国经济能够成功跃入新的发展阶段提出一些关键性建议。政府和私营部门需要在多个方面迅速采取一致行动，改变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几十年的固有发展模式，从而增强中国经济抵御海外风险的能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增加家庭平均收入，最终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中国的个人消费仅占GDP的36%——在世界上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排名最后。这反映出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导致个人消费比重偏低。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了支持战争的需要，消费大幅降低以利于大规模的工业化，美国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也从未低于50%。纵观今天主要的亚洲经济体，日本的个人消费占比为55%，韩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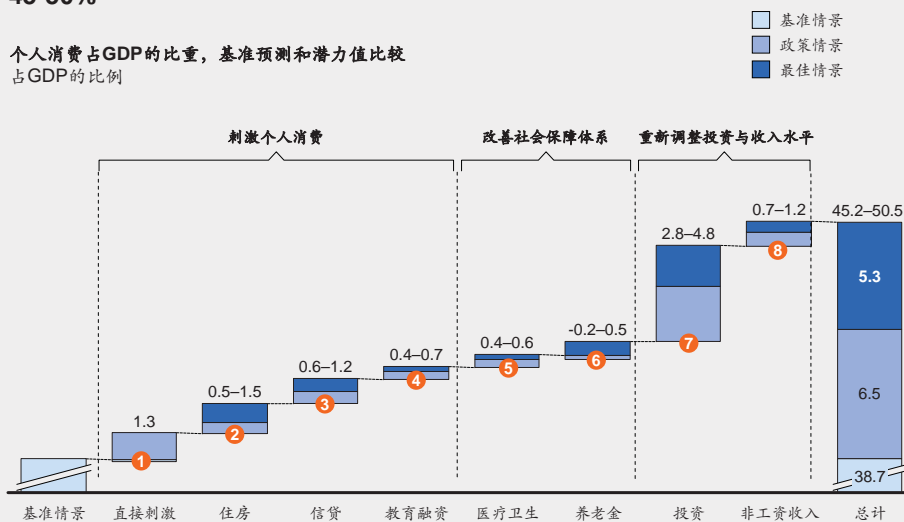
1 除非另外注明，此处以及本文其他部分的“消费”一词仅指个人家庭消费。



图E1

如果实现所有主要政策目标，到2025年中国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可提升至45-50%

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基准预测和潜力值比较  
占GDP的比例



资料来源：环球透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模型；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为48%。两个相对较为偏重消费的经济体——美国 and 英国的个人消费占比分别为71%和67%。尽管个人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并不存在最优水平——甚至一些观察家认为个人消费占比超过70%与中国的36%相比同样不合理——但我们相信就中国而言，接近50%的比例与亚洲同等国家相比更为合理。

根据宏观经济的基准预测，并假设政策制定者们未来不会采取进一步刺激消费的行动，未来15年中国较低的个人消费占比仅会略有增长。然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认为中国能够通过采取刺激消费的政策，到2025年增加8至15万亿人民币的消费（除非另有说明，所有列举的数字都是以2000年人民币的实际价值计算）——这个范围的上限比目前法国的GDP总量还高。按照目前GDP的增长率进行假设，到2025年个人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将提高6到11个百分点，达到45-50%。这等于人均消费将比基准预测提高5500-10600元人民币（26-50%）。

我们的研究表明，若干政策的实施将降低中国家庭的储蓄率。数据显示，当前家庭储蓄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中约占25%。我们认为到2025年，通过上述政策的实施，家庭储蓄率将比基准预测的17%降低6到12个百分点，即届时中国家庭储蓄大约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5-11%。尽管居高不下的储蓄率经常被认为是抑制消费的主要原因，但我们发现即便在储蓄行为发生较大变化的情景下，中国个人消费占比与基准预测相比仅能增加2-5%，还不到中国个人消费潜在提高比例，即6到11个百分点，的一半。

鉴于储蓄率的大幅变化只能对消费带来相对较小的影响，我们的研究认为，虽然消费者支出和储蓄行为的改变确实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提

高中国家庭收入在提升消费占比方面的重要性不亚于前者。<sup>2</sup>此外,很多上述政策改革并不直接针对消费者行为,而是旨在通过鼓励更加有效的投资和资本分配,最终实现个人收入的快速增长。这些政策和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及改变消费者支出行为的政策对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 更高的个人消费将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上述政策的好处不仅是提高个人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消费和服务导向型经济在每单位投资上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在中国也将看到:假如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45-50%,中国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平均家庭收入将增长10-20%,国内企业及创业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尤其是在零售和服务业。

同时,中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将增强,对外汇储备的需求也会降低,并通过其他政策的实施帮助其缓解因全球贸易不平衡所带来的国际紧张局势,这是因为到202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将减少25-40%。<sup>3</sup>此外,减少能源、水和土地等资源的消耗将有助于缓解环境压力。

除了上述积极影响之外,向消费导向型的经济转型(在本文中详细阐述的部分),与基准预测相比,还能够大幅提高中国经济的总产出。这来自于更高的消费支出和更高的政府开支间的组合,而这些开支又可以反过来刺激就业和经济增长。考虑到乘数效应,中国向消费导向型经济体转型可以使GDP在2025年提高6.5至11.9万亿人民币,比基准预测高出8-15%(图E2)。这相当于在2010-2025年间已经高达7.7%的GDP年复合增长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0.8-1.2个百分点。

从全球角度看,到2025年,中国占全世界的消费比例将上升至11-13%,而根据目前的经济趋势预测仅为8.9%。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15年中,中国在全球新增消费中的占比将超过25%,而基准预测仅为18%。<sup>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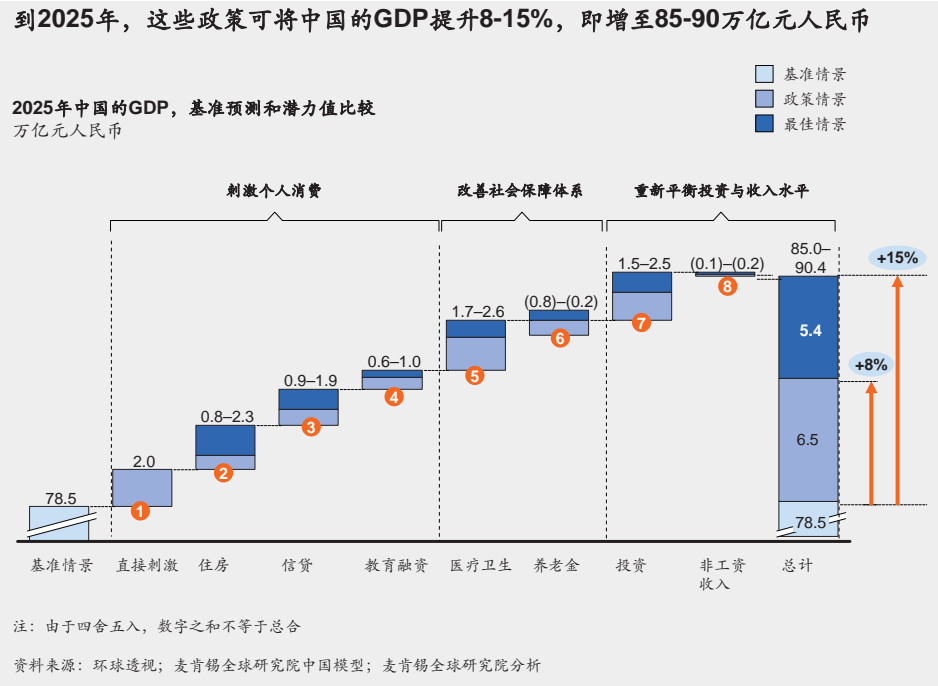
为了确保实现这些国内和国际上的利好,中国必须选择新的发展模式——在多方面同时采取一致行动、从而提高成功的可能性。当今的消费比重过低是体制性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必须开展全面的改革,包括结构性的变革。

<sup>2</sup> 我们的研究承认还存在很多举措可以让更多的GDP转化为家庭收入,包括制定法定最低工资标准,更为有效地组织劳动力等等——那些在其他国家被验证过的举措。我们将在未来的研究中考考虑这些方面。

<sup>3</sup>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根据环球透视的GDP预测假设了几种宏观经济情景。

<sup>4</sup> 本计算假设在2008到2025年之间,全球实际GDP的年平均增长为2.9%。

图E2



### 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心可转向消费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提出三大类政策并对他们的潜在影响进行量化分析。这些政策可以帮助中国在未来15年提高个人消费水平。我们研究的目的并非提供政策建议，而是估算这些政策的实施对经济总量和消费占比的影响。

为反映这些政策实施的程度，此项研究关注了两种情景——政策情景和最佳情景——并将每种情景下的政策影响和现有宏观经济的基准预测情景进行比较。

政策情景包括中国目前已经开始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和改革——不管它们的初衷如何，这些举措很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人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在政策情景中，到2025年中国可以将消费占GDP的比例提升至45%，比基准情景高出6个百分点。如果中国可以实现这一转变，则GDP总量和个人消费将会分别增加约6.5万亿人民币和8万亿人民币——相当于GDP比基准情景高出8%，而个人消费比基准情景高出26%。2025年的人均消费水平将从基准预测的21000元人民币提高到26600元人民币以上。

在最佳情景中，我们假设在此项研究所涉及的每个问题上都会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在这一情景下，中国的个人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将达到50%，推动GDP增长11.9万亿人民币，消费增长15.2万亿人民币——分别比基准情景高出15%和50%。人均消费水平将达到31700元人民币以上。

## 中国可以直接刺激消费

这组政策包含一系列相对短期的举措,重点是建立更加完善的“消费基础设施”,使中国消费者能够更轻松地购买到比现在更加丰富多样的产品和服务。有些改变需要消费者减少对可支配收入的储蓄,还有些是通过使用消费信贷让消费者提前消费。中国可以考虑的两大政策方向包括:

1. **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提高产品的质量。**这方面的行动可以在2015年之前将消费占比提高1.3个百分点,并在2025年之前一直保持这一水平。目前,中国较大、较富裕的城市与小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可用的零售商品和消费者体验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具体行动可以包括支持现代化零售业态、渠道和分销网络的发展(如二手车市场和汽车租赁市场,以及许多品类的网上销售),并鼓励消费品行业国内外企业的持续发展。
2. **提高消费信贷的可获得性并提高消费者认可程度。**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当前消费信贷的可获得性和使用度都比较低,即便与处在相似发展水平的亚洲其它国家相比也是如此。中国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信贷服务的可获得性,并鼓励更多消费者负责任地使用消费信贷,作为满足住房、教育和其他消费需求的一种融资手段。这将有助于消费者以未来的收入作为保证进行借贷,提前消费购买大额物品,提高目前的生活质量。如果这些政策实施得当,可将消费占比提升1.5至3.4个百分点,并最终帮助中国家庭在未来创造更多财富。

总的来说,这一系列政策加在一起到2025年有望将中国的消费占比增加2.8至4.7个百分点。到2025年,GDP将比基准预测高出4.2至7.2万亿人民币,或5.4至9.2个百分点。总的个人消费支出增长将成为这一GDP增长的主要部分,消费支出将比基准预测高出4.1至7万亿人民币,或约13.5至23.1个百分点。人均消费支出将增加2800至4900元人民币。

## 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将拉动医疗保健和养老保障的支出

自改革之初,中国在医疗保障和养老金等社会服务的收支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影响到了国民福利的质与量。改善由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减少人们过度的预防性储蓄,增加在医疗和养老保障上的整体支出,从而增加国民的选择性开支。在很多方面来说,改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是向前迈进的关键一步,不仅仅是为了促进消费。中国当前经济的飞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带来各种不公平现象,而提供更全面的社会福利可以缓解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此外,更高质量的医疗和养老保障将在长期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并改善中国的发展前景。

尽管上述政策意义重大,且上述领域经常被认为是导致低消费的主要原因,但我们发现政府为了扩大医疗和养老保障的覆盖面和改善质量所增加的投资,将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个人消费在GDP所占比例的提高。尽管到



2025年，改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增加个人和政府医疗卫生和其他方面的开支高达每年4-11万亿元人民币，但中国的消费占比仅能增加0.2到1.1个百分点。相对于基准预测值，个人消费将增加4800亿元至1.9万亿元人民币，或提高1.6到6.3个百分点，由此推动人均消费增加300-1300元人民币。总体而言，上述举措将使总体GDP高于基准预测值9000亿元到2.4万亿元人民币，或高于2025年基准预测值约1.6-3.4%。

## 开展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家庭收入的增加

该组政策包含一系列广泛的举措，对金融系统、产业政策、国际贸易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其他很多方面均产生影响。本报告所提到的三组政策中，该组政策需要最大幅度的结构性变革，而且我们认为，即便政策发生很大转变，其对消费占比和宏观经济结构的总体影响也只能到2025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但我们的分析表明，即使只到2025年，假如中国的经济结构能大幅向服务业转型，并辅之以金融改革以加快非工资收入的增长，消费占比将会提高3.5-6.0个百分点。

**向服务业转型。**中国政府领导人意识到，将投资转向效率更高的劳动密集而非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将在就业、经济增长和消费方面实现乘数效应。假如在2010年后政府能够实现服务业每5年增长3个百分点的目标，即2005年出台的第11个五年计划所阐明的目标，那么到2025年服务业在GDP中的比例将达到49%。这一小幅度的变化可以推动家庭平均收入到2025年比基准预测增加9-10%，这是因为服务业能够更加快速地创造就业，提高生产效率，推动工资增长。然而，个人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却只能增加2.8个百分点，这是因为服务业的增长也将带来投资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个人消费占比的增加。假如中国能够开展更为积极的变革（像一些评论家所设想的，达到目前韩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例，约55%），工资收入的增加将高达20%，相应的消费占比可最多提高4.8个百分点。这样的转变需要在人力资源和技术上投入巨资，以提高生产率，并吸纳1亿多新增劳动力进入服务业。

**提高投资性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家庭的投资性收入偏低，仅占家庭总收入的不到2%，并且这部分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一直没有增加。中国目前金融资产的实际收益率仅为0.5%，而韩国为1.8%，美国为3.1%。<sup>5</sup>尽管从长期来看，提高家庭资产收益率需要对中国金融系统进行大规模变革，但实际上只要为中国高储蓄的家庭提供更多金融产品和服务，如共同基金、固定收益产品、年金、现金股利等，就可能取得较大的成效。到2025年，投资性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个人消费占GDP的比例就大约增加0.3-0.4个百分点。例如，投资性收入占平均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从1.7%增加至3.4%，则个人消费占比可增加0.7个百分点。将投

5 《令中国资本运转：金融体制改革的价值》，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06年5月（[www.mckinsey.com/mgi](http://www.mckinsey.com/mgi)）

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增至5.1%，则个人消费占比可增加1.2个百分点。

鉴于中国的目标是向服务型经济转型并促进收入的增长，以下三方面政策的发展前景尤为乐观：

1. **鼓励金融领域的改革。**中国可通过改革国有企业的股息派发制度并鼓励创造更多的金融工具使家庭更多地参与到金融市场当中，实现非工资性收入的增加。两项并举还可鼓励企业制定更合理的投资决策，允许家庭分享企业所创造的利润，获得分红并提高家庭资产的长期回报率。此举有助于资本再分配向个人和服务业的倾斜。中国已积极开展金融体制改革，但目前改革进程尚未完全按计划进行。中国应考虑进一步扩大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发展，作为提高个人消费占比的目标之一。
2. **积极开展产业整合，提高效率。**中国进行产业整合的空间很大，尤其是像钢铁和水泥等较成熟的行业，通过整合可提升生产力。效率的提升也至关重要。目前像水、煤炭、土地以及资本等稀缺资源都是以低于市场价格提供给工业企业的。政府应缩减为促进这些行业增长所进行的直接和间接补贴——比如调整关税、或鼓励制定更具商业可操作性的信贷决策，都将有助于提高投资和资源使用的效率。政府还可以对资源的使用建立征税体系，使得企业的成本体系和资金分配机制能够在考虑中国能耗成本的基础上更加准确地定价。
3. **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中小企业的成功发展。目前，中小企业面临一系列市场准入的壁垒及发展阻碍（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一样）。如要提升中小型服务企业在中国经济活动中所占的份额，就必须改革工商营业执照办理手续，提供更多支持性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更加方便的信贷服务。

上述政策可使个人消费开支比基准预测高出3.4至6.3万亿人民币，即增加10-20%。随着家庭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实际的好处，家庭平均收入增加10-20%，平均每个家庭的个人消费将增加8000-15000元人民币。和基准预测相比GDP将增加1.4-2.3万亿人民币，即增加1.8-2.9%，同时私人消费的增加会导致投资和贸易顺差的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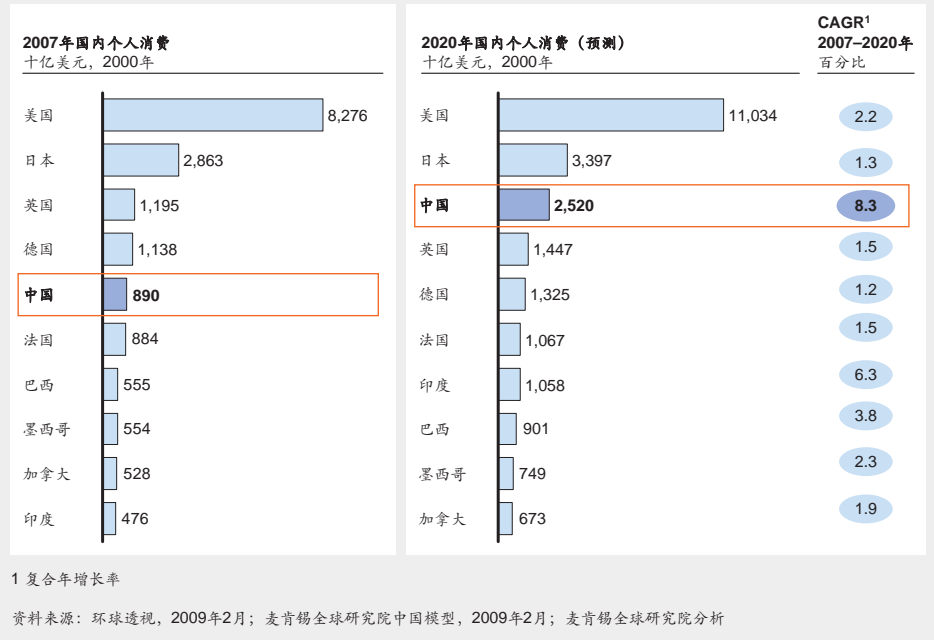
□□□

在第一章中，我们将探讨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及增长路径，并分析为何经济能够从国内个人消费占比增长中获益。第二章，我们将找出导致中国消费滞后的主要原因，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目前低消费占比的形成过程。第三章，我们将就推动中国经济向消费导向型增长模式转变的政策进行讨论，政府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开始推行其中的很多政策。我们将评估这些政策对中国和全球经济可能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第四章为简要总结。最后，我们为有兴趣了解本报告中所使用的宏观经济假设和方法论的读者，提供了技术附录。

# 1.中国消费低于其财富水平

近来中国已经赶超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从消费者支出的角度看，与现在的经济实力相比中国的消费水平过低，远远排在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之后，位于第五名（图1）。<sup>6</sup>按照目前的趋势，预计今后15年中国消费将以年复合增长率8%以上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三大消费市场。

图1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预计今后十年仍将保持强劲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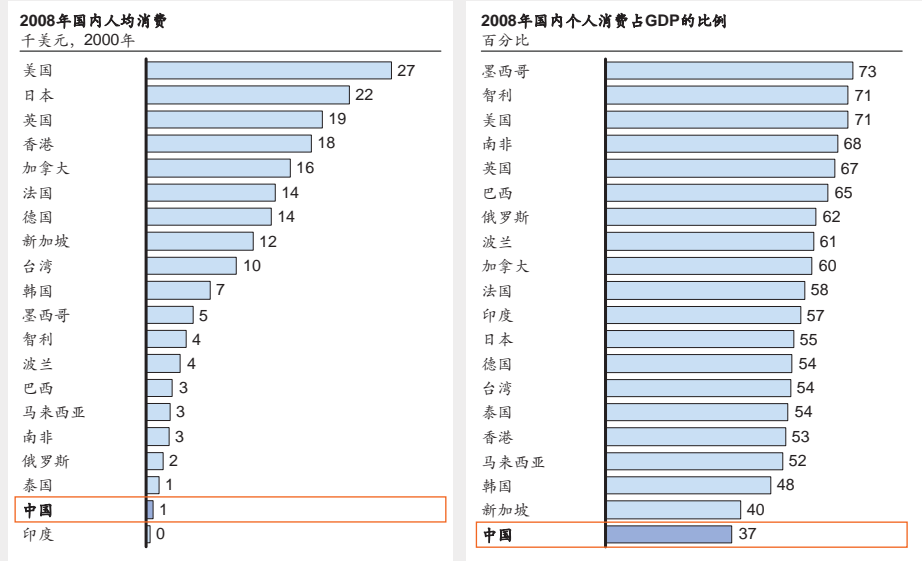
但事实是，尽管经济规模庞大，但中国目前的消费远远不足（图2），而且如果当前的趋势和政策保持不变，这种情况还将延续。2007年人均个人消费不到5600元人民币（按实际2000年人民币价值计算不到700美元），不但远远低于世界发达经济体的普遍水平，也低于包括亚洲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此外，中国的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幅下滑。如果这一趋势不变，未来15年都不会出现大幅反弹，消费占GDP的比重只会略微增长，从目前的36%增至2025年的39%左右（图3）。这个比例在二十国集团（G20）之中排名倒数第二。只有沙特阿拉伯，因大量的石油产品净出口抢占了个人消费份额，导致消费占比低于中国。

6 除非特别注明，否则所有估值都在2000年实际人民币或美元价值基础上计算。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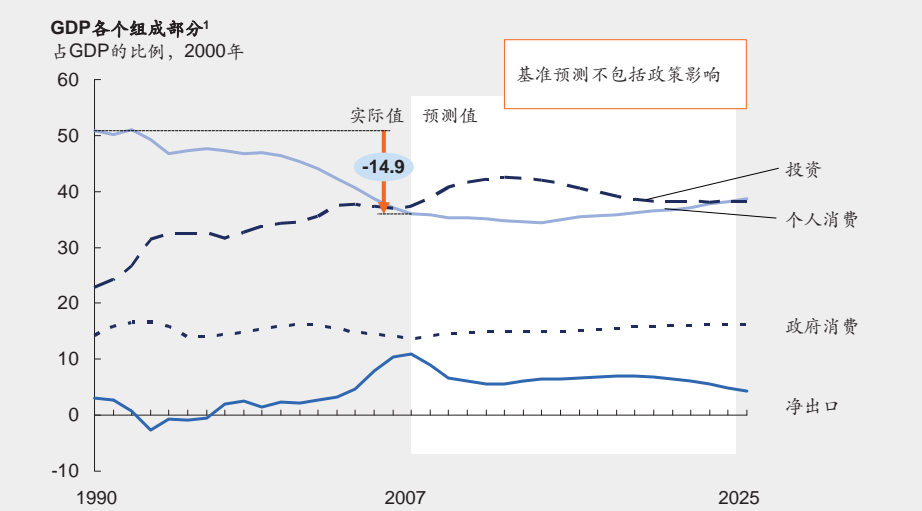
但中国的人均个人消费水平及消费占GDP的比例仍然较低



资料来源：环球透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模型；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图3

过去15年中国内个人消费占GDP的比例大幅下降，假如趋势不变，未来出现大幅反弹的可能性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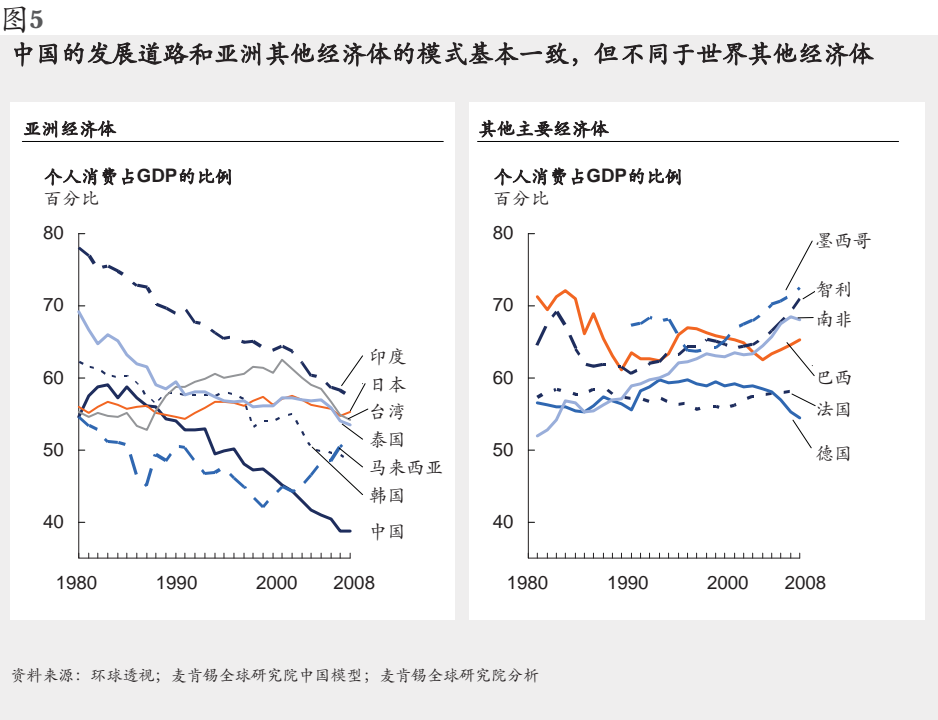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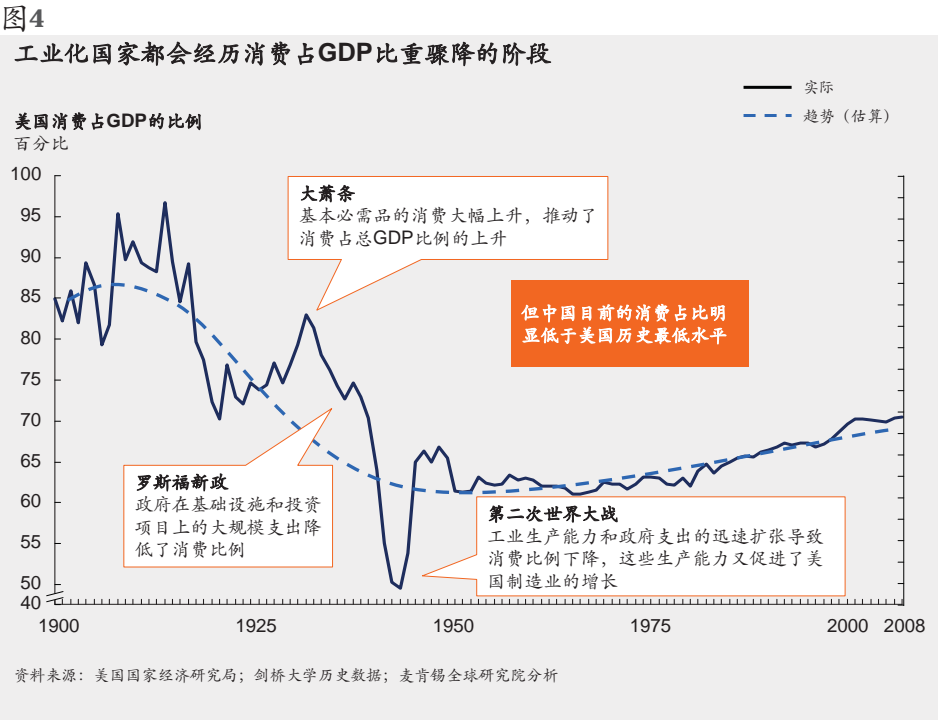


1 由于库存变化，所有年份的各组成部分之和可能不到1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宏观模型，2009年2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中国消费占比偏低且持续下滑，加上投资和净出口居高不下且不断扩大（2008年投资和净出口两项共占GDP的近48%），但这种情况并非独一无二。实际上这是工业快速发展时期各经济体普遍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尽管数据有限，但美国仍可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参考点。中国当前的人均GDP大致等同于美国19世纪50年代的水平。在大规模工业化之前，美国消费占GDP的比例很高。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大部分资金投入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上，消费占比曾出现大幅下滑（图4）。战后，美国的消费占比逐步上升到现在的水平。即便把中国放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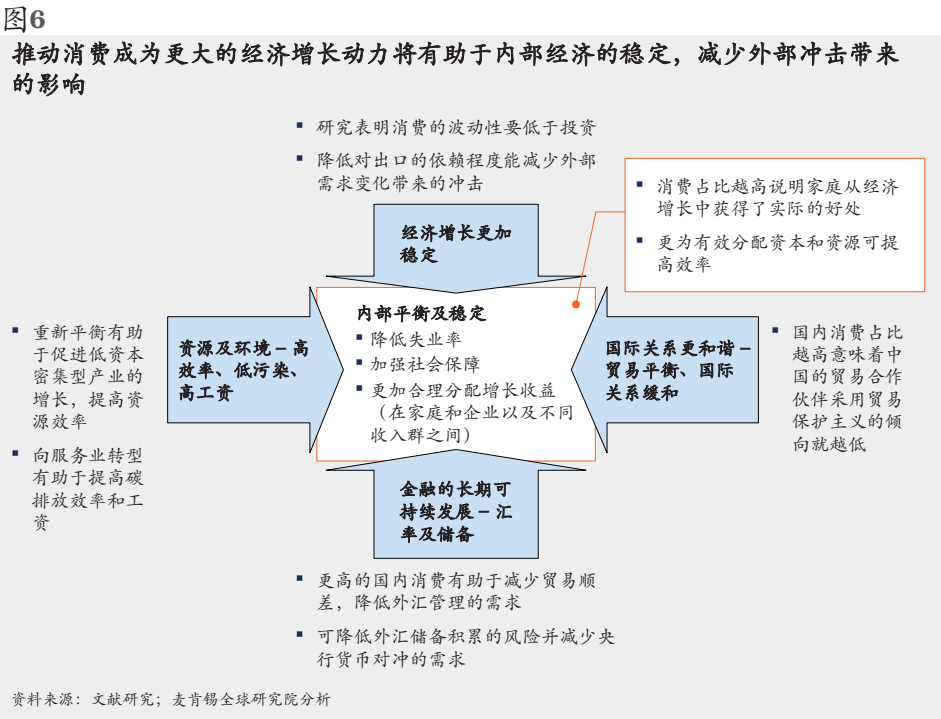


这样的背景下，其目前消费占比甚至还远远低于美国历史上的最低点。

其他亚洲经济体也普遍经历过消费占比偏低且不断下滑的阶段，甚至有些亚洲邻国在工业化成熟的时期也曾出现过消费占比下降的情况，这与世界其他地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消费占比不断上升形成鲜明对比（图5）。亚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经历过消费占GDP比重下降的阶段，这是因为在全球贸易快速增长和资本流入的大前提下，亚洲国家纷纷采取了积极的出口推进工业化（EPI）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

但中国的消费占比还要低于亚洲其他国家。问题是这是否重要？毫无疑问，中国和亚洲整体都曾将现有的发展模式利用至极致，获得了巨大的收益。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中，中国实现约3.9亿人脱贫。<sup>7</sup>2000年以来，中国家庭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几乎翻番，从每年448美元增至833美元。从1990年至2008年，人均实际GDP增长超过5倍，而1990年至2005年非农GDP的比例从73%增至89%——另一个广泛用于衡量发展的指标。经济飞速发展也代表了亚洲发展的总体特点。1990年以来，亚洲（不包括日本）的人均实际GDP几乎增加两倍，创造了3亿多个新的就业机会——这都是在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模式下所取得的成果。

然而，中国政府领导人已经开始意识到，高消费占比对于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繁荣将带来乘数效应和巨大优势（图6）。



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最惊人的一大动力是快速的城市化进程。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研究估计，到2025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增至近十亿。<sup>8</sup>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涌入城市，政府的主要顾虑是如何确保为这些人提供同样增加的就业机会。实际上，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能否保持社会稳定取决于能否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创造足够多的工作岗位。

7 我们采用由Shaohua Chen和Martin Ravallion得出的按2005年贫困线为1.25美元/天的购买力平价进行计算，《中国比我们设想的贫穷，但减贫依旧成就非凡》，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工作报告，2008年5月，第4621号。

8 《迎接中国十亿城市大军》，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09年2月（www.mckinsey.com/mgi）

当前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仅能提供这么多的新工作岗位，我们的研究表明，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将有助于更快速的就业增长。通过对中国以外的34个大型经济体样本的劳动力及投资数据的分析表明，与消费相关的行业在单位投资上所创造的工作岗位高于工业。例如，我们发现从2000年到2007年，采矿业每多投资100万美元，平均仅能创造0.1个新工作岗位；而把相同的100万美元投资于零售、批发、餐饮和酒店业，则能创造2.4个新工作岗位。

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中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高的国家之一和最大的煤炭消耗国。根据麦肯锡研究院以前对提升中国能源效率可能性的研究，中国的产业结构是导致能耗高的主要因素。<sup>9</sup>消费相关行业和服务业的资源使用效率均高于重工业。重新调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工业转向服务和消费等“软性”行业，将对政府已经开展且值得褒奖的环境保护工作起到助推的作用，实现经济的可循环、可持续发展。

令中国政策制定者们感受最深的大概就是由美国金融业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下滑对中国出口造成的影响——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第一个五年里——这同时也暴露了中国经济抵御海外风险的能力较弱。从2002年到2007年，净出口的增长使得中国GDP复合年增长率提升了1.3个百分点。尽管在此期间，净出口平均仅占GDP的6.7%，但对GDP增长的贡献却为22%。然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一增长动力随着国际贸易市场需求的不断萎缩而受到严重影响，使得中国出口在2008年10月至2009年5月撰写本报告之时每月接连跌至新低。促进国内消费不仅能够保证国内经济的可持续且富有成效的增长，同时还还将增强中国经济抵御像目前金融危机这样外部冲击的能力。

一方面，拉动消费可以减少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另一方面，与投资或出口相比，消费在经济周期中的波动性普遍更低。一项涉及70多个国家的学术研究显示，投资的增长标准差是消费的近两倍。投资可以根据经济周期的需求而推迟，<sup>10</sup>而消费者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则倾向于更加平滑稳定的支出模式，因为至少一部分消费是对基本必需品的刚性支出，难以推迟。大体来说，投资拉动型经济更多出现在那些经历快速工业化的国家。经济发展越快的国家，受货币市场失衡冲击的影响将越大。

拉动国内消费将吸纳可能流入出口领域的富余产能，而家庭支出增加还可以推动进口的增加。两者加在一起将缩小中国的贸易顺差。因而，中国将减少外汇储备方面的需求。中国领导人已经看到高额外汇储备的风险越来越高，但又不得不接受这个巨额贸易顺差和严格资本管制下的必然产物。尽管单凭提升消费占比不足以纠正全球贸易失衡问题，但这种转

9 《遏制全球能源需求的增长：提高能效机遇》，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07年5月 ([www.mckinsey.com/mgi](http://www.mckinsey.com/mgi))

10 Horst Siebert著，《世界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纽约：Springer，2004年

变将影响国际上有关中国持有外国资产安全性以及人民币价值等金融问题讨论的基调,而所争议的这两个问题都是由于中国贸易的严重失衡所导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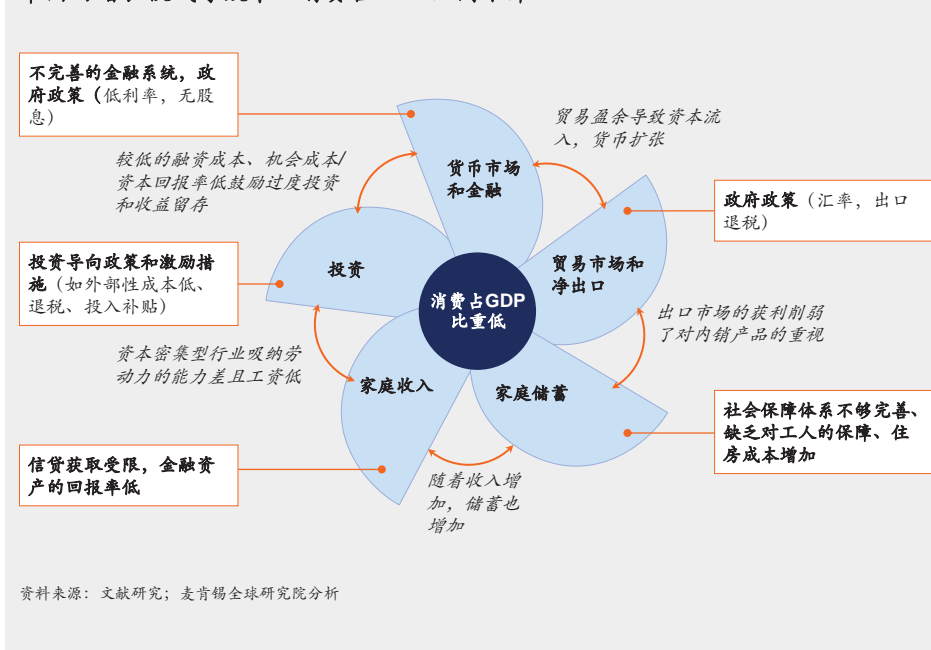
本章已经阐述了中国消费占比过低的具体情况和一个“平衡的中国经济结构”可能带来的益处。现在,我们将通过国际对标来分析中国消费占比为何如此之低。

## 2. 中国为何消费不足

我们很难界定中国消费占GDP的“理想”比例应该是多少——在这方面没有黄金准则。然而,我们发现以西欧国家的消费占比作为基准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西欧经济体实现了较为均衡的增长,并未出现美国经济中过度消费的现象。我们认为,中国的低消费状况是个体制性问题,并非来自中国固有文化差异导致的结果——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一直推崇的是投资,而不是收入和消费(图7)。

图7

中国的增长模式导致个人消费占GDP比例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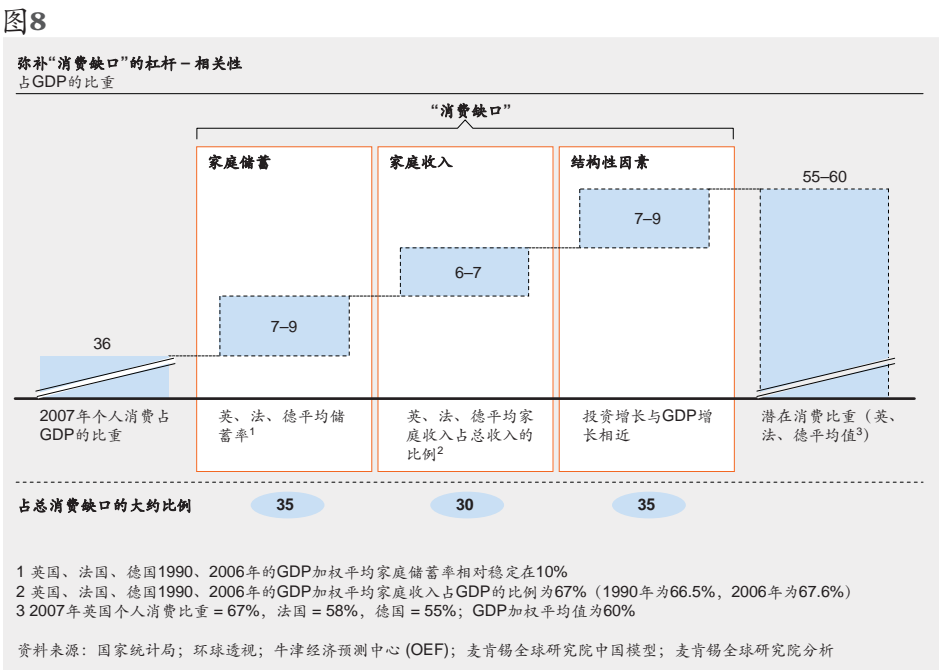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几个方面,包括贸易特点、产业结构和金融业的成熟度等方面,相互作用、共同导致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中国作为低成本生产国的地位以及不断增加的全球出口需求都刺激了资本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行业的发展。因此,随着资本的大量流入导致贸易顺差的增加,且由于金融市场不够完善,公司无需派发股息或无法投资较为复杂的金融产品,所以导致公司利润也随之积累。资本过剩和有限的投资选择降低了投资项目的资本回报率标准,进一步鼓励了投资密集型行业的发展。

以工业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导致家庭收入,相对于经济增长总体水平而言,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些公司对中国的大型劳动力市场拥有绝对的垄断权,但与非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相比,他们吸纳的劳动力较少。最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行的国企改革使得国企利润大幅提升的同时,降低了国企提供社保服务的责任。由于各级政府只能部分填补所缺失的责任,因



此家庭储蓄率也随着越来越高的医疗和养老费用的不确定性而升高。最终，我们发现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国内金融体系现状、企业对再投资的偏好、家庭收入占比偏低、家庭储蓄率过高等因素共同导致了消费占GDP比重偏低。

在这个系统中，我们用西欧经济体的消费占比作对比，明确和量化了三个制约消费且相互关联的主要因素。自1990年以来这三个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消费占GDP的比重（图8）。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不断攀升的家庭储蓄率和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下降，以及投资和出口的不断扩大是造成中国消费过低的主要原因。根据我们的历史分析，这三方面因素对制约中国的消费都起到了几乎相同的作用。



中国家庭储蓄率居高不下，且仍在不断攀升

中国平均家庭储蓄率高达年均可支配收入的25%，这一比例高于包括亚洲邻国和西欧在内的很多国家，且近年来一直稳步上升（图9和图10）。收入的上升在中国未对这一趋势带来任何影响：收入越高的家庭储蓄越多。我们的研究发现，导致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主要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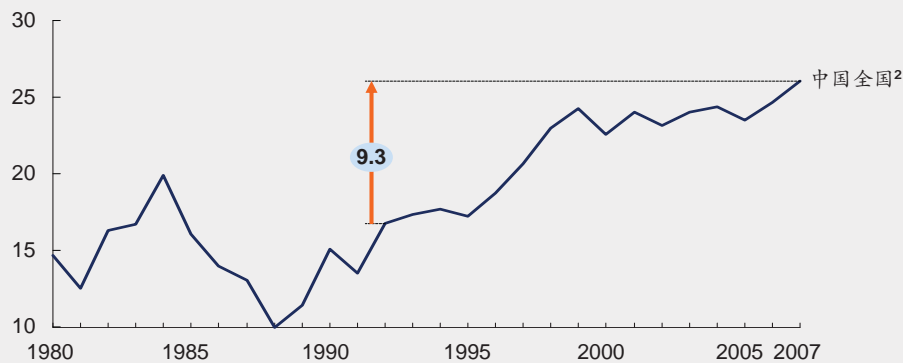
1. 中国相对有限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医疗和养老——可能导致了预防性“过度”储蓄。近年来，国民的医疗、养老、失业福利和其它基本社保服务成本不断增加，而国内的社保体系却未能同步增长，覆盖范围非常有限。由于各类费用的不确定性和自身支付能力有限，加上缺乏强大的社会和个人保险，国民不得不通过储蓄的形式自我保险。一些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进一步加剧了储蓄过高的现状。在其它主要经济体中，企业和公共部门共同承担缴纳社会保障的费用。可是近几年来在中国，企业在社会保障中的角色逐渐淡

图9

### 过去15年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一直稳定上升

#### 中国家庭的平均储蓄率<sup>1</sup>

百分比



1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根据国家统计局和CEIC数据开展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

2 根据城市和农村趋势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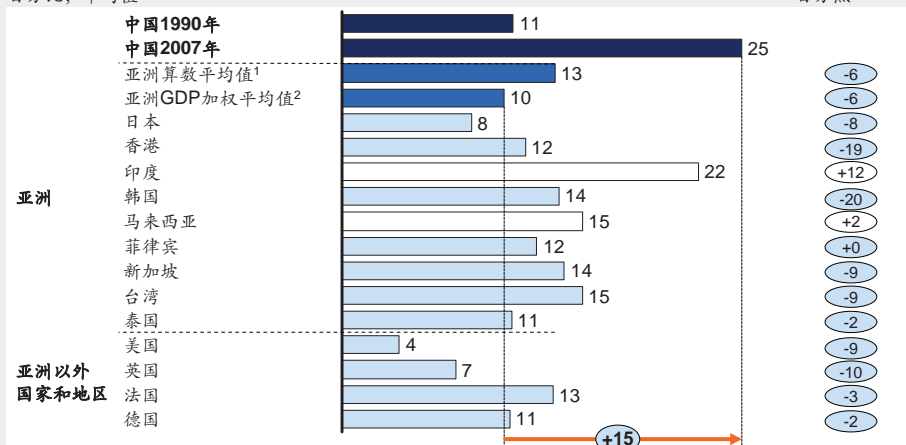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CEIC数据;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图10

### 中国的储蓄率一直高于亚洲其他经济体

#### 家庭平均储蓄率, 1990-2007年

百分比, 平均值



1 算数平均数这里包括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

2 以实际美元价值计算的2007年GDP总值进行加权

3 用百分点来表示百分比变化 (如从20%降到10%可以用-10%来表示)

资料来源: 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数据来自牛津经济预测中心; 中国数据来自CEIC;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出。过去, 大多数人都在国企工作, 国企直接为员工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 当时被称为“铁饭碗”。但是,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革开放时期, 中国政府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行业竞争力, 免除了它们在这方面的社会责任, 并转移到政府身上。虽然提供社会保障服务的责任是转移过去了, 实现这些责任所用的资金和收入仍然保留在企业中。这相当于让政府在没有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履行社会保障的责任, 从而导致社保服务管理分散化。其结果是, 不同地区的居民所享受到的社会保障服务质量存在很大的差异, 也为这个目前拥有1亿多而预计到

2025年将达到3.4亿流动人口<sup>11</sup>的国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虽然人口流动性增加,但社会福利的流动性并没有跟上。根据中国的户籍制度,基本只有拥有所在地户口的居民才能获得社会福利。也就是说,在户口地以外地区工作的居民无法享受社会保障。上述所有变化都导致社保服务的重担更多地落在了国民个人身上,甚至拥有一定社会保障的人也要储蓄,因为他们不确定这些保障是否能起到作用。

- 2 **中国消费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使储蓄率居高不下。**和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中国消费者具有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反,边际储蓄倾向较高),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耳熟能详,包括缺乏量身定制的产品;商品价格高于平均收入水平;农村地区缺乏现代化的零售商店,限制了产品渗透和消费支出。现代零售业态——例如品牌连锁店——在中国农村仅占消费的18%,而在城市中则为50%。然而,近70%的农村消费者表示更愿意在现代化的商店中进行购物,标志着巨大的未被满足的需求。服务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在中国还有待发展,例如二手市场和电子商务。
- 3 **中国消费者较少使用信贷。如果现金不够,他们会提前储蓄,以支付大额费用。**信贷的获取通常是允许消费者超前消费,通过消费信贷的方式提前获得未来的收入,现在购买、以后支付。在中国,随着收入的快速增长,这样的行为会推动消费比收入更快的增长,同时也带来未偿信贷的增长。中国的未偿消费信贷<sup>12</sup>仅为GDP的13%,远低于其它亚洲国家,例如韩国,未偿消费信贷占GDP的70%,马来西亚则为48%。

在很多消费领域,包括耐用消费品、住房和高等教育支出上都存在着消费信贷渗透率低的问题。在中国,这些领域的消费都需要大额储蓄。但如果消费者有能力和意愿借助贷款来获得资金,即可避免大额储蓄。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行的房屋产权私有化,更进一步地加强了储蓄的需求;少量使用抵押贷款加上大额的首付款导致消费者储蓄迅速增加。房屋抵押融资缺乏创新也抑制了消费,因为金融创新产品(如反向抵押贷款和房屋净值贷款)可以帮助消费者释放用于其积累的住房财富,使其转变为可用于目前或退休以后消费的资金。经济学家们通常将西方国家繁荣的消费归功于这些创新——但也有争议说这些手段过度地刺激了消费——但这些都不是中国消费者习惯使用的消费融资手段。

同样,虽然中国政府设立了两套助学贷款体系,但是获得教育贷款仍然很难,而且最需要助学贷款的学生经常无法获得贷款。由于贷款违约率高,银行回收贷款手段有限,导致银行无法为高等教育上的投资自由放贷。教育融资的缺失一方面构成人们储蓄的动机,另一方面成为发展高素质劳动力的瓶颈。

11 《迎接中国十亿城市大军》,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09年2月 ([www.mckinsey.com/mgi](http://www.mckinsey.com/mg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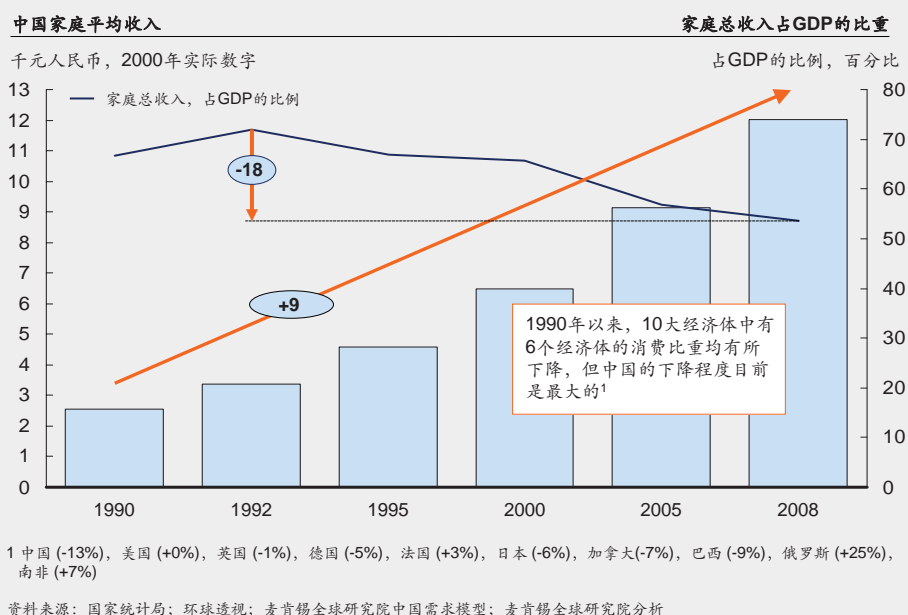
12 消费信贷包括房屋抵押消费贷款和非房屋抵押消费贷款,其中房屋抵押消费贷款占总消费贷款的80%



## 家庭收入占比正在下降

虽然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企业利润大幅增加，但消费者在这块不断增长的大蛋糕中所占有的份额愈来愈小，这是因为家庭收入增长不及GDP的增长（图11）。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的家庭收入占GDP比例偏低（图12）。这一份额从20世纪90年代72%的最高值下降到2007年的55%。而企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不断升高，这主要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因素，过度强调重工业的增长，所造成的。重工业的岗位增加速度低于其他行业，导致个人收入上涨缓慢（图13）。从2000年到2007年，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复合年增长率比GDP的增长率低3个百分点。虽然中国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相对较低，但不足以补偿中国更低的可支配收入。例如，为了购买等同于美国劳动者一

图11 尽管家庭收入增加了，但家庭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却在下降



小时工作收入可获得的商品和服务，中国劳动者需要工作七个小时。

对于收入份额下降存在几种解释。首先，由于近年来数百万的农民工弃农进城务工，为持续增长的制造和建筑等行业提供大量的劳动力供给，这导致中国总体就业增长缓慢。其结果是从2000年到2006年，总就业率每年增长不到1%，而同期GDP的增长速度为10.8%。由于工业中劳动力收入占比低于农业，导致家庭总收入增长仅为7.6%，远低于GDP增幅。尽管农民工的收入比从事农业劳动的时候多，但事实依然是企业在总收入中所获得的比重不断增加。

第二，根据最近一项针对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方法调整的研究，在2004年以前，家庭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实际接近于2007年的54%，而不是官

图12  
中国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低于其他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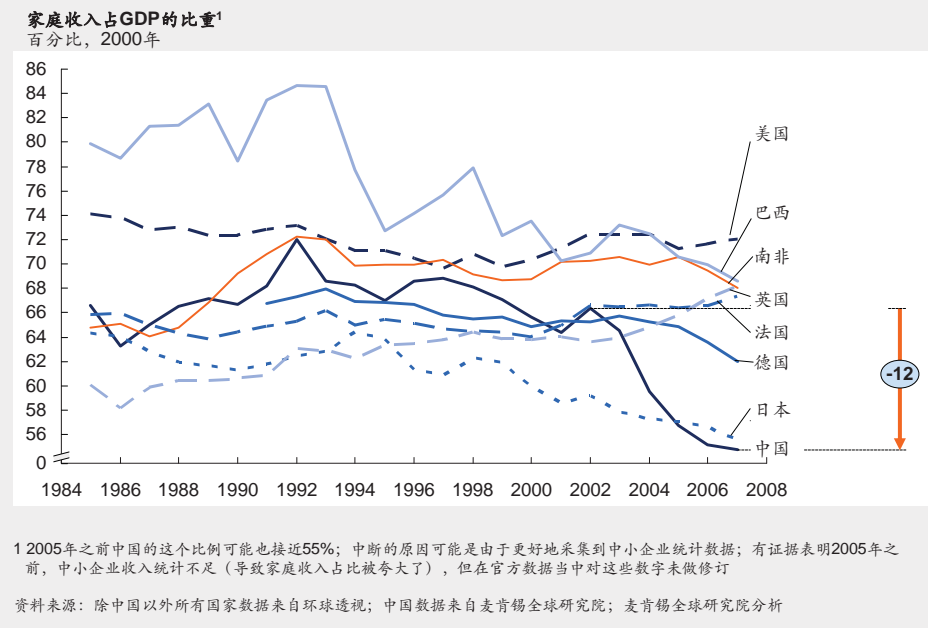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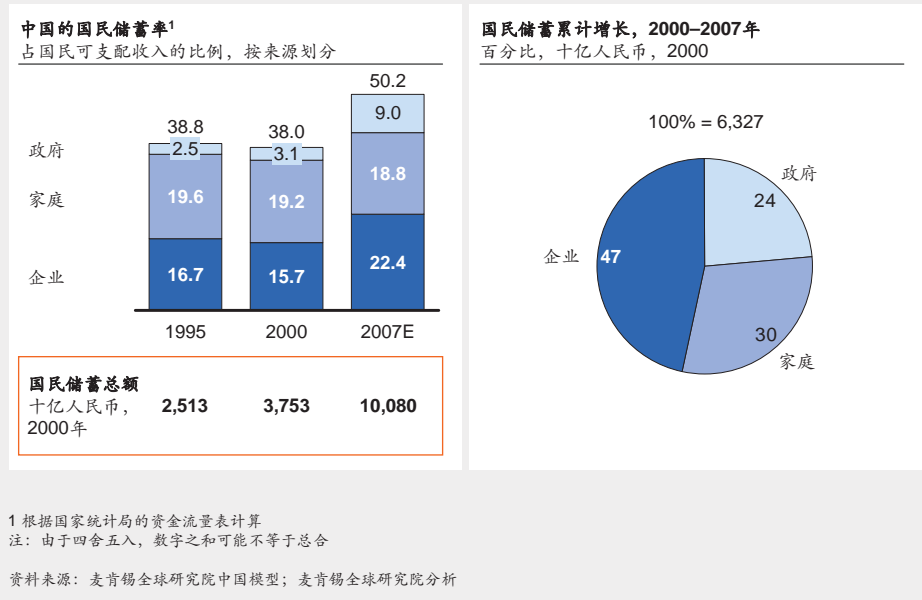


图13  
从经济增长中获益最大、且推动国民储蓄率上升的是企业而非家庭



方数据的65%或更高。<sup>13</sup>在2004年更改以前，国家统计局将自营业主的收入也算作劳动力收入，忽略了产生这些收入的成本，造成自营业主的家庭收入被夸大了。自调整以后，国家统计局对这部分人的收入进行更加准确的计算，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是按照成本、而不是收入来计算。尽管这并不能说明这一份额为何低于其它国家，但解释了2004年中国家庭收入所占

13 白重恩，钱震杰合著的《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字背后的故事》，《经济学期刊》2009年第2期。

份额大幅下降的原因。

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大幅减员和削减的社会福利费用，都导致了家庭收入占比下降。与其它企业的员工相比，国企员工获得了总收入中较高的份额。中国将企业为员工提供的福利作为可支配收入计算，国企对于员工福利义务的减少，以及劳动力逐渐流向私营企业，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收入份额的下降。

最后，清华大学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当企业在市场中占有垄断地位时，员工收入份额就会下降。从1995年到2007年，尽管国企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开始弱化，但是它们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却在增加。这些企业的员工自然在工资和福利谈判方面的话语权降低，从而使得员工收入份额的下降。

另外，非工资收入和财富积累，包括股息和资本收益，在中国都非常有限。虽然中国的金融业发展迅猛，但是与发达国家、甚至亚洲邻国相比，中国的金融业尚欠发达。银行业仍然是金融投资领域的主要渠道，尽管银行提供的实际储蓄利率非常低。诸如共同基金等更加复杂的投资机构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作用远不如在发达的金融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中国，家庭通常不是金融市场的积极参与者；他们的总收入中仅有非常小的一部分来自投资收益和利息收入。另外，高昂的交易成本也影响了房屋等资产销售所获得的资产收益。尽管收入对于拉动消费会起到很大作用，但是财富效应也十分重要。当资产升值的时候，消费者对自己的购买能力更加自信，从而刺激消费。同时，在下一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公司缺乏向股东派发股息的动力，也限制了用于潜在消费的资金。

### 中国的投资导向型、工业密集型的增长模式抑制了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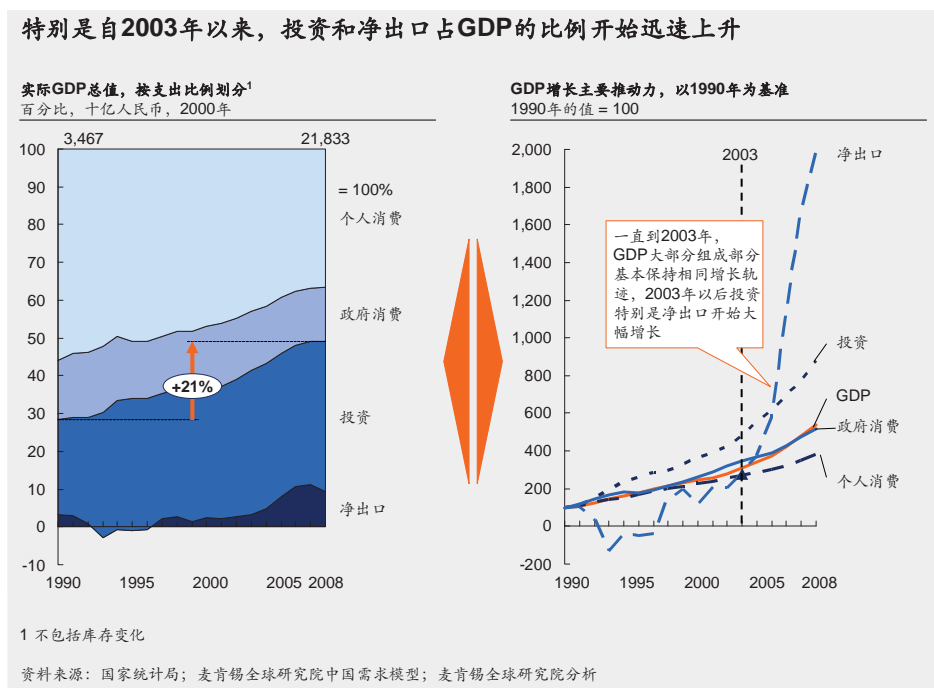
中国的投资导向型、工业密集型的增长模式以及对出口的依赖在为企业带来收益的同时，也抑制了消费。自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国内市场需求强劲、出口市场发展迅猛，近几年中国的公司获得了非常丰厚的利润，其中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因此，企业对国民储蓄累积增长的贡献大于经济中的任何部门。根据最新获得的国家统计局2005年以来的资金流向数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计到2007年企业利润将占到GDP的22%。

在中国的金融环境中，公司债券市场不够发达，同时缺乏要求公司派发股息的有效政策，这导致公司留存了大部分利润。由于缺乏有吸引力的金融投资渠道，公司需要做出的决定就非常简单：他们或者将留存收入存到低回报的银行账户，或者进行再投资，进一步扩大产能，以获得更高额的回报。也就是说，企业在决定某个投资项目的时候，面临很低的投资回报率标准。

如果企业能够以支付股息的形式重新分配利润，这将对刺激消费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方面可以使作为股东的消费者增加收入，同时还将提高

企业投资的机会成本,迫使他们做出更合理可行的决策以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率。然而,目前的问题是继续投资于低效产能,而不是招聘更多员工、提高工资、或派发股息。此外,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民营化和改革进程为企业免除了为员工提供良好社会保障的责任。这就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投资产能、然后继续扩大出口来吸收这些产能、公司收入占经济的比重继续增多,从而进一步抑制消费。

一些其它的结构因素也促进并加强了中国的投资密集型产业结构。全球图14



对中国相对低成本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导致了长期的贸易顺差和大量资本流入,从而形成了有利于中国制造商的低利率环境(图14)。

由于金融市场缺乏效率和深度,使得国内大量可用资本都集中在四大国有银行。在这些国有银行成立之初,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支持中国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虽然中国的经济在很多方面都开展了改革,但银行一直保持倾向于向大型传统工业企业提供借贷。虽然中小型企业构成中国经济活动中的大部分,但由于中国金融部门一直采取倾向工业部门的政策,导致它们所能获得的信贷非常少。这种政策失衡不断鼓励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增长,而此类行业所产生的收入和就业增长远不及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因此推高了非消费部分占GDP的比重。

简而言之,企业部门占据了全国的收入和储蓄的主要部分。从2000年到2007年,企业占全国储蓄增长部分的47%,家庭约占30%,政府约占24%。巨额的企业储蓄和有限的金融投资渠道都导致了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标准降低,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投资导向型的产业结构。

### 3.刺激消费： 推行三大政策“组合拳”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分析中国可能采取的政策选项，以解决造成消费不足的根本问题。

中国政府已下定决心要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但是，由于中国消费不足背后的原因涉及广泛，甚至在有些方面，还涉及到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问题，而正是这种发展模式使得中国近几年的发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只有采取综合全面的方法才能成功地调整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有些政策是短期的，而有些是长期的；有些政策能够“立竿见影”，而有些将需要复杂和结构性的转变。

我们的分析表明，在现有的宏观经济趋势下，未来15年消费所占份额仅会有小幅增长。但通过一些政策的实施（其中有些政策中国已经开始实施，有些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可以在2025年之前将个人消费提高15.3万亿人民币，这一数字比法国全国的GDP还要略高一些。这些措施可以在2025年将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到45%至50%之间，同时与基准预测相比，年GDP还会增加8%至15%。

在本章中，我们将详细介绍中国政府可以考虑采用的三类政策“组合拳”。第一类政策包括一些短期举措，即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信贷的供给，“促使”消费者更多消费。第二类政策包括对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长期改革，以改善医疗和养老保障的覆盖面，并刺激消费和经济增长，培养更健康高效的劳动力，减少预防性储蓄。第三类政策包含一系列广泛的举措，将经济发展的重心从当前强调工业投资转向提高服务业和消费相关行业的就业。

针对每个问题，我们都对三个情景中实现政策首要目标的潜在影响进行估算，这三个情景旨在反映刺激消费政策的不同实施程度。总体而言，我们认为政策情景整体上都在中国决策者的计划之内有所体现。然而，问题是中国将采取部分还是所有潜在措施，政府能否快速地实施变革，不同举措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并非要提供政策建议，而是研



究政府如果采取刺激消费的政策会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和消费占比产生怎样的影响。欲了解在不同情景中各种政策会对关键的宏观经济指标产生怎样的具体影响，请参见技术附录。

##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了三种政策实施路径

在此报告我们将提出的三种情景称为“基准情景”、“政策情景”和“最佳情景”。<sup>14</sup>

**基准情景。**基于现有趋势和政策，我们预计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9%（欲了解中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具体趋势预测，请参见技术附录中的表1）。基准情景中对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估算依据的是环球透视机构的GDP预测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需求模型到2025年的预测。基准情景的依据是计量经济预测，这一预测主要是根据人口、经济和政策动因之间的历史关系而得出的，所以并不能反映出政府政策变革的潜在影响，即使这些变革是为人所熟知和了解的。

**政策情景。**无论初衷是否在于刺激消费，中国政府正在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改革很可能会从某种程度上影响消费占GDP的比重。我们称这类举措为“政策情景”。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实施此报告中所讨论的政策，到2025年，中国的消费占比可高出基准情景6.5个百分点，达到45.2%。同时，在这些举措的拉动下，中国年均总体GDP和个人消费将会分别增长6.5万亿和8万亿人民币——相比基准情景，GDP和个人消费将分别高出8%和26%。以2000年人民币实际价值计算，2025年的人均消费将从预测的21000人民币上升到26600人民币以上。

**最佳情景。**如果中国能够以积极的姿态实现上述所有政策杠杆的目标，那么中国的消费占比可以达到50.5%的“最佳”目标，这更接近于国际对标和中国可及范围内的政策方向。除了消费占GDP的比重更高，最佳情景还可以使GDP提高11.9万亿人民币，消费提高15.3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分别比基准预测提高大约15%和50%。以2000年人民币实际价值计算，人均消费可以达到约31700人民币。尽管我们认为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就理论上而言，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也就是说比现有计划或比已宣布将要采取的计划都更加积极，而这些政策需要非常有效地影响消费者行为。

## 潜在的风险和警告

当然这些估算也存在着上下波动的风险。首先，我们所作的是比较静态分析。尽管我们考虑了支出对GDP的乘数效应，但我们没有考虑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反馈效应——比如利率浮动或资本流动。其次，由于我们的分析都与基准分析相关，所以基准分析本身的一系列假设都关系到每种政

<sup>14</sup> 在评估实现主要政策目标所产生的影响时，我们将对GDP和其要素的价值与趋势线情景相比较，以了解多少变化是由于政策变动所产生的，多少是由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

策情景所产生的影响。比如，我们在下一部分会继续探讨到的，中国投资支出增长率不可预见的偏差。这些偏差既不是基准分析的预测，也不包含在政策建议中，但却可能大幅改变基准预测，最终会导致每种举措对消费占比产生更大的影响。最后，不可预见的中国政府的大型政策变动——比如，人民币汇率迅速调整，或对资本流动的限制进行调整——可以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我们的结论。

在所有这三种情景中，我们认为对消费占比的结论是相对保守的，因为如果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低于基准预测，那么这一更低的GDP主要是由于低于基准情景的投资水平和净出口造成的，而非由消费造成的（研究表明与消费相比，投资更具波动性，而且更易受公司和政府决策的影响而出现下滑）。在这些不同的情景中，消费占比的增加很可能会比我们预计的更高。同样地，如果中国实现了我们所描述的政策目标，我们预计GDP会提高8%到15%，但这一预测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最终目标仅仅是以更高的GDP为驱动的。我们认为，不管中国经济发展走哪条道路，甚至经济增长由于分析之外的因素而放缓，这里所描述的消费刺激措施都会促进GDP的增长。也就是说，只要政府采取这些措施，就会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政府可以考虑推行三大政策

为了保证向个人消费的转型是可持续的，并且有利于中国总的发展目标，而非仅仅为刺激消费而刺激消费，那么中国需要在政策组合中同时采取短期和长期两类举措，通过直接刺激和结构性改革来解决消费者支出

图15  
重新调整投资和收入水平对提升中国个人消费占比的影响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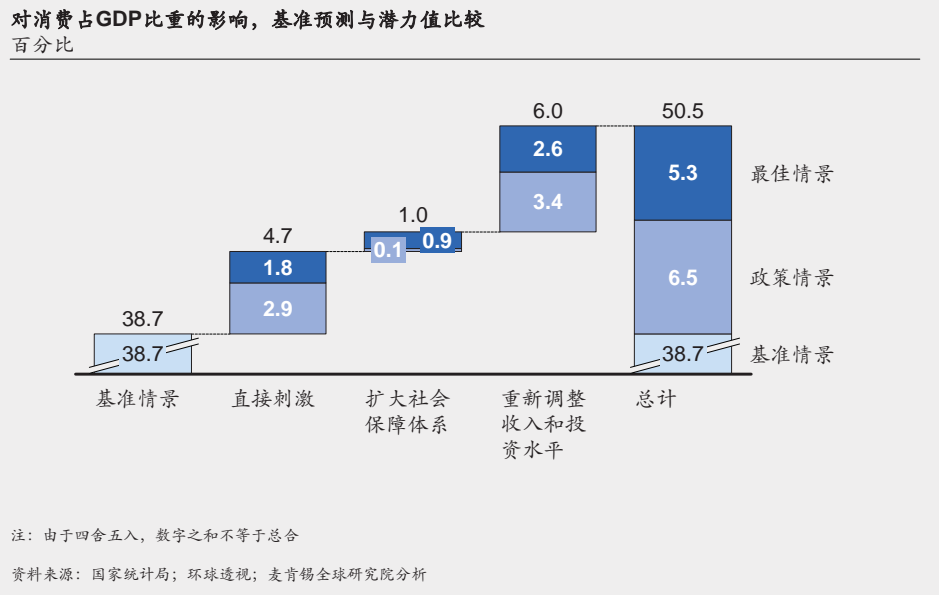


图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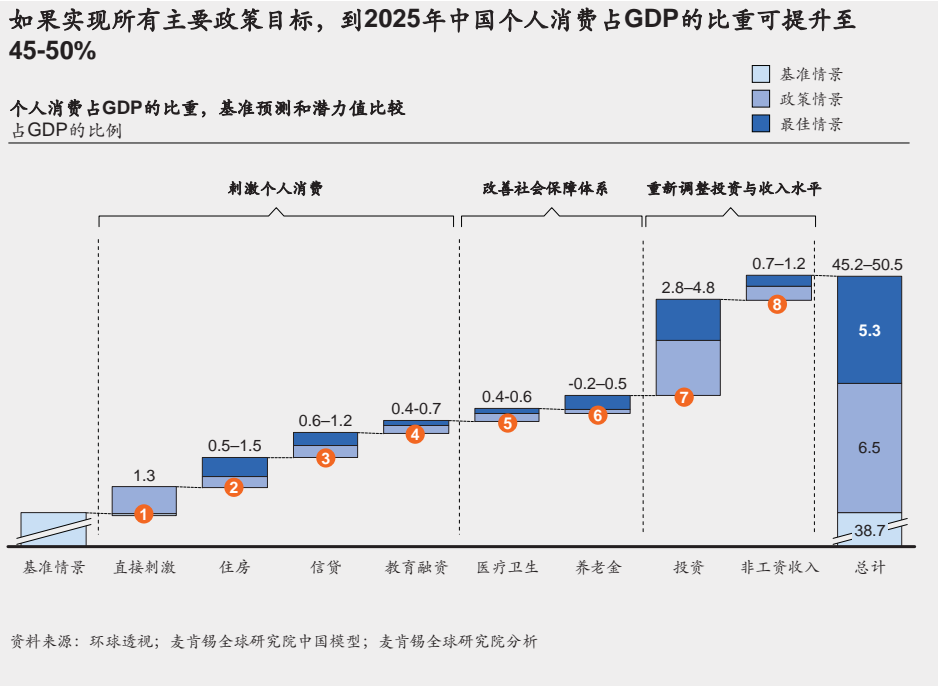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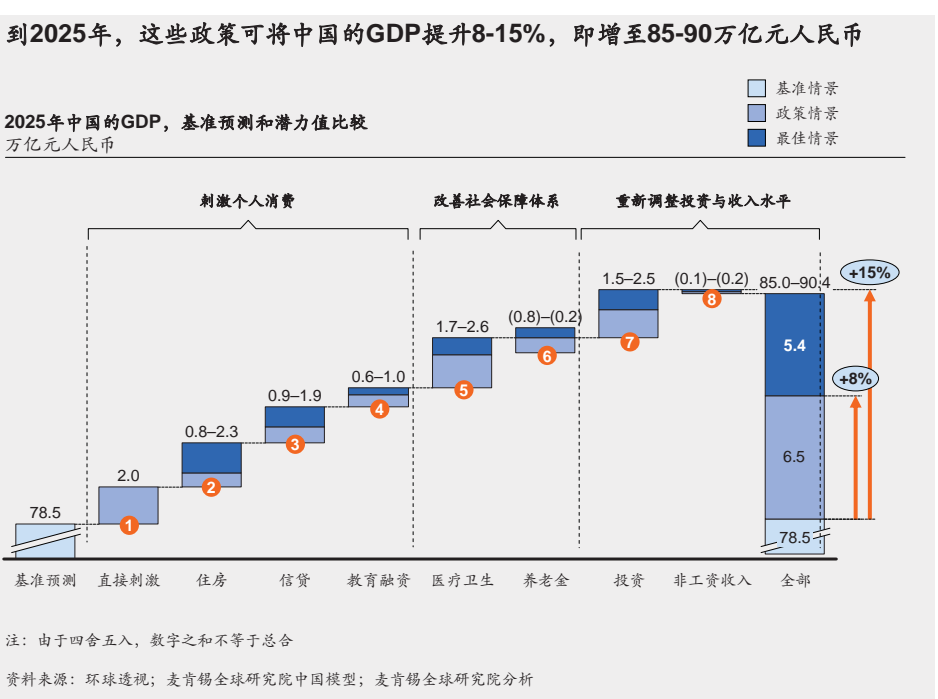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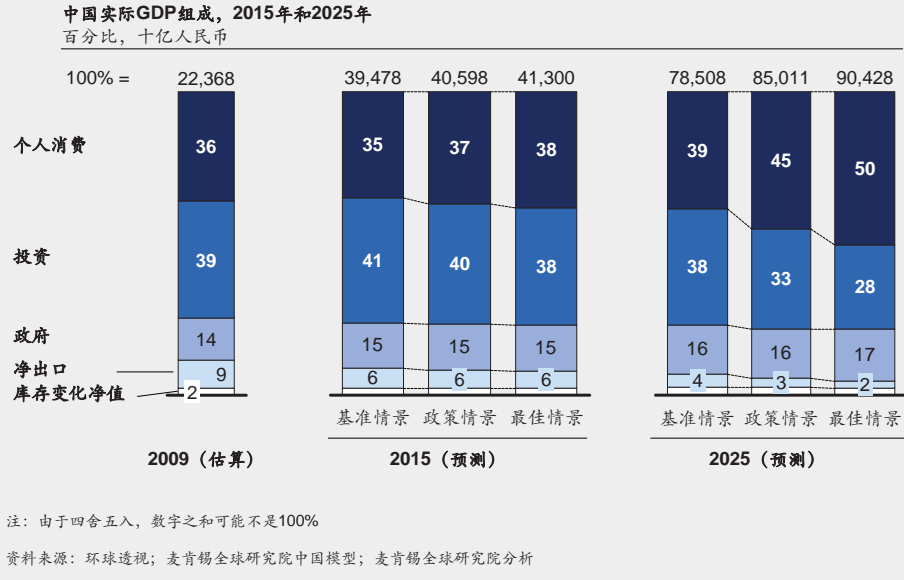
图17



问题。这三类政策相辅相成，需要同时推进才能达到全面拉动内需的效果。如果所有举措都得以实施，消费占GDP比重会达到45%至50%，具体比重取决于实施情景，并且GDP会提高8%至15%（图15至18）。欲了解我们在每种政策中所采用的方法和假设，请参见技术附录。



图18  
到2025年，GDP所有组成部分与基准情景相比均会有所增长，但由于个人消费比例从36%增至45-50%，因而增长结构将发生变化



直接刺激个人消费能够在短期内增加中国的消费比重

这一组政策包括一系列相对短期的举措，重点是建立更加完善的“消费基础设施”，鼓励中国公民增加消费，避免因缺少零售机会，或者缺乏获得商品和服务的可行途径而不得不储蓄的现象。这些举措包括提供更多的产品，提高商品的质量以及提高消费信贷的可获得性以及消费者认可程度。

这一组措施是一套可行且具有积极成效的行动方案，可以使中国消费者获取更加丰富的产品和服务，享受更高品质的生活。这些举措需要很少的投资、会在短期内取得成效，并且无需对中国现有发展模式做出结构性调整。调查结果表明，这一组政策将会在2025年以前使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增加2.8到4.7个百分点。到2025年，GDP会比基准预测高出4.2万亿到7.2万亿人民币，或增长5.4%到9.2%。个人消费支出的增加将成为这一GDP增长的主要部分，消费支出约比基准情景高出4.1万亿至7万亿人民币，或者说比基准情景高出约13.5%到23.1%。人均个人消费将增加2800元至4900元人民币。

## 中国能够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更好的质量

中国农村及小型城市与大型富裕城市在零售设施及消费者体验方面相差甚远,这也是现在消费占GDP比例较低的一个常见原因。到2015年中国可将消费占比提高1.3个百分点,并通过改善并扩大全国的消费基础设施将此水平维持到2025年。这里的基础设施指的不仅是运输和通讯类的有形基础设施,还包括消费和零售相关的无形基础设施要素。这还包括支持现代化零售业态、销售渠道和分销网络(例如,二手车市场和租赁市场,多种品类的网上购物)以及鼓励消费业出现更加多样、更具实力的参与者(例如综合类的农业企业,负责端到端的供应链管理,确保产品质量和供给)。

将资源集中在具有最高增长潜力的消费品类,才能最大限度地刺激消费。麦肯锡中国公司的研究部门找出了13个最具有发展潜力的“重点品类”,这13个重点品类的消费额约占2007年中国城市总消费额的85%,对刺激就业和消费(见副文1)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针对这些重点品类推出的刺激消费的举措可取得最大、最快的成效,同时将能够创造比其他部门更多的就业机会。

因为中国尚处在消费基础设施发展的初级阶段,且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所以中国在制定决策方面拥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灵活度,这些决策将影响几代人的消费观念和行为。推出一系列有效的政策组合拳后,中国政府能够通过刺激那些相同投入下收效较大的行业,实现一些可观的收益。但是为了最大程度发挥政策的效果,中国政府需要运用其号召力,搭建和民营部门之间的桥梁,促进公共和民营部门的合作,推动具体的举措。

## 提高消费信贷的可获得性并推动使用能够刺激消费

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目前消费信贷的普及状况和使用率都较低,甚至低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亚洲国家的水平。中国应出台相应措施,推动和鼓励消费者负责任地使用消费信贷,满足购房、教育和一系列其他消费的融资需求,让消费者提前消费,购买大额商品,提高他们当下的生活质量,并在某些情况下帮助他们在将来创造更多财富。

我们研究了中国可能扩大的三类消费信贷的潜在影响,这包括住房抵押贷款、教育贷款和其他消费贷款。

### **房产: 增加消费者对抵押贷款的使用**

在过去15年内,中国住房的快速私有化推动了储蓄率的上升并提高了住房拥有率。在中国,超过75%的城市居民已经拥有自己的房产,80%的尚未拥有房产的城市居民计划购买住房。<sup>15</sup>但是,房屋销售总价中仅有23%是使用抵押贷款进行融资的,在美国这个比例则是65%。部分原因是抵押贷款

15 这些反馈来自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2009年4月所开展的“中国城市消费者储蓄行为调查”。这次调查用了两周的时间电话访谈1212位调查对象。这次调查包括五个模块,总体储蓄行为、养老金、教育、医疗和住房。调查对象样本覆盖城市人口所包含的所有层级、年龄、性别和收入,具有代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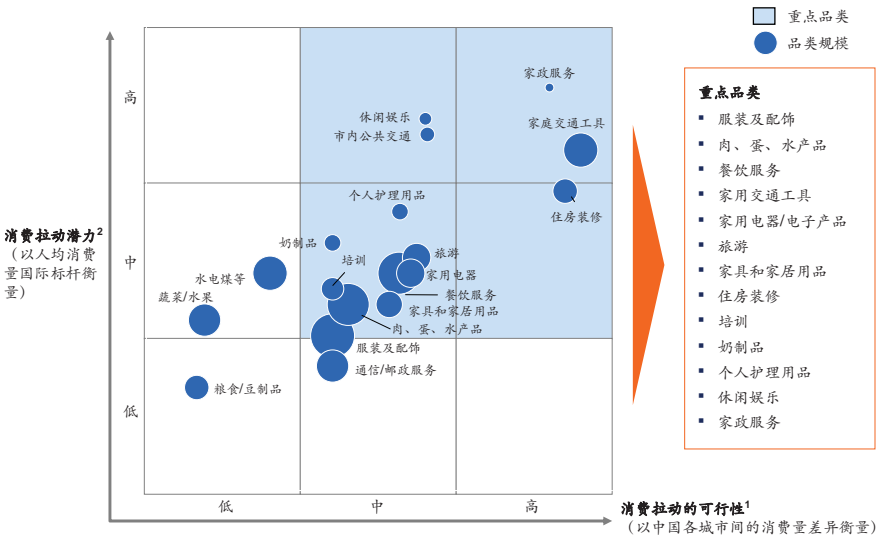
副文1:直接刺激消费的重点领域

麦肯锡中国公司依据以下三个标准找出了13个具有较高的拉动需求潜能的“重点品类”：就消费规模本身该品类的重要性，相对于国际标准的内需拉动潜力，以及实施的可操作性（根据中国城市间的比较）。此外，这13大重点品类中很多对消费和就业都有乘数拉动效应，能够带动未来的经济效益。例如，服务行业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因此对就业和经济发展具有乘数效应。旅游业、教育和家政服务行业在中国属于规模大的服务行业，未来的发展潜力不可限量。

这13大重点消费品类包括服装及饰品、肉、蛋和海鲜、餐饮、汽车、家用电器和消费电子产品、旅游、家具和家用商品、房屋装修、继续教育、奶制品、个人护理、休闲活动以及家政服务。以家用电器和消费电子产品为例，相比国际对标，中国在这类商品上的消费潜力巨大。2007年，中国消费者在消费电子产品上的人均消费仅有50美元；但俄罗斯、巴西和马来西亚在此品类上的人均消费为85美元。中国不同城市对消费类电子产品的需求差别迥异。在该品类消费排名前十位的市场中，家庭年收入在4400美元至7300美元的家庭在消费电子产品上的人均消费约为200美元，是来自排名后十位市场、相同收入水平的农村家庭消费的近三倍。这说明那些“落后”市场大有消费潜力可以挖掘，特别是当“落后”市场消费者的家庭收入逐步赶上排名靠前的市场家庭收入水平（图19）。

图19

重点关注恰当的产品品类能够最大程度地扩大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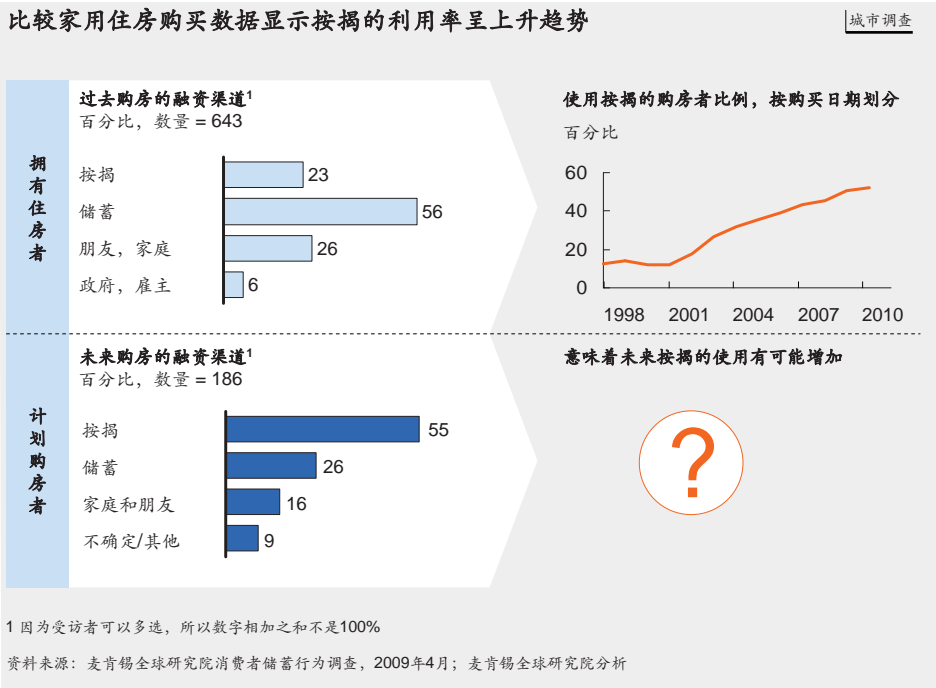
1 涉及长期举措（如基础设施建设、医疗体制改革等）  
2 消费拉动潜力是指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人均消费差距；消费拉动可行性是指中国前十大城市和后十大城市间的人均消费差距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EuroMonitor；世界银行；麦肯锡分析

在购房者中的渗透率较低,中国城市购房者中约有52%表示希望使用抵押贷款,而美国购房者使用抵押贷款的比例是85%。还有部分原因是使用抵押贷款购房者需要支付较高的首付款。中国购房者的平均贷款对房屋价值比率是46%,美国则是76%。

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增长以及抵押贷款的缺乏意味着:若购买一套住房,中国家庭比其他国家的消费者需要筹集更多的首付。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帮助想要购房的消费者克服这个障碍,从而将用于房产投资的存款释放到其他个人消费上。2008年,政府规定将首套住房的最低首付从房价的30%降低到20%。购房者将逐步适应并利用这一政策变化,意味着购房者的借贷可以从原来房价的70%上升到80%。

但是降低购房首付款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为了更大地刺激消费者投资,降低首付款比例和提高按揭贷款的可获性和使用应结合起来。2009年4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开展了一项城市消费者储蓄行为调查,结果表明至少在城市地区,按揭贷款的渗透率在过去的10年中已从12%增加到52% (图20)。在我们的政策情景中,我们假设按揭贷款的渗透率保持现有水平,仅靠最近政府降低首付款的规定,将推动贷款对房屋价值比例逐步升高到53%,将使用按揭贷款的房产销售比例从基准的23%增加到28%。

图20



在最佳情景中,我们假设政府同时实现按揭贷款渗透率(增加到78%)和贷款对房屋价值平均比例(增加到65%)这两个目标。虽然这有些雄心勃勃,但这些比例仍低于许多西方国家,甚至有些亚洲经济体。使用按揭贷

款的房产销售比例只能增加到51%，这大致和香港目前的水平持平，远低于美国63%的普遍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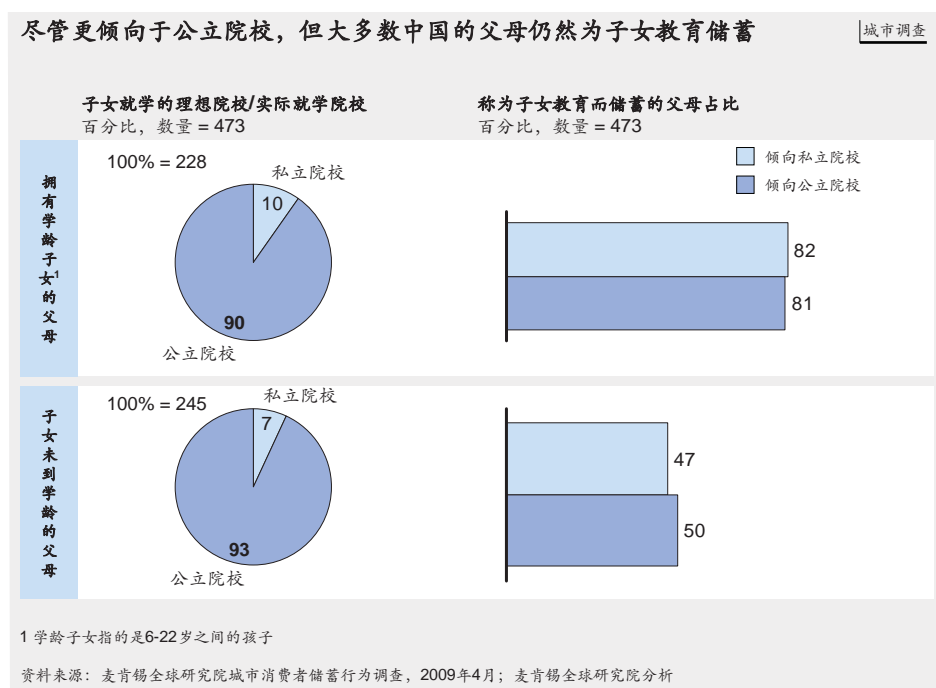
通过评估这两种情景下所需的储蓄需求，我们发现将用于购房而提前储蓄的比例将分别降低12%至36%，相应地，可分别拉动消费占GDP比例增加0.5%及1.5%。我们假设在两种情景下，中国房产销售的增幅到2015年之前将超过GDP的增幅，然后增幅开始下降，到2025年和GDP 增幅持平。这说明到2025年，中国房屋销售总额占GDP的比例将达到美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水平，也就是最近一次美国购房潮开始之前。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购房者在所需支付的首付款减少的同时将面临一个决定。他们可以减少储蓄，购买原先计划购置的房产，这将拉动消费；或者他们可以选择购买价格更高的房产，或提前购买原先计划购买的房产，在这种情况下房产销售的加快将刺激对新房的投资。上述哪个因素占主导将决定这对消费和GDP的影响程度。出于本次研究的目的，我们假设拉动消费的效果将起主导作用。

### 教育: 增加高等教育的贷款

中国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总是寄予厚望，其中97%相信他们的子女能够进入大学，因此会为教育储蓄所需经费。教育被认为是家庭储蓄最普遍的动机，60%的城市家庭表示会为子女的教育储蓄（图21），主要目的是确保他们的子女能够支付上大学的费用。小学和中学教育并不是家长储蓄的主要原因，因为国家提供九年的小学到中学的免费（义务）教育，并做了大量工作改善入学和教育质量。

图21





但是,大学学费和生活费十分昂贵。一位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平均每年的总花费相当于中国家庭平均每年可支配收入的近48%。虽然随着中国家庭收入的增加,这笔费用对他们造成的压力会逐步减轻,根据基准预测到2025年会降低到23%,但大学教育费用的绝对金额还会继续增加。这对越来越多需要供养子女上大学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为大学生提供助学贷款是减少因教育而储蓄、推动消费的一个主要因素。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两套助学贷款计划,但是仅有10%的学生参与其中,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们不愿意背负贷款。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声称为子女教育储蓄的中国城市家庭中,53%的家庭表示不愿意或未曾使用助学贷款来减少教育储蓄。中国大学生就业率低可能是导致家长对助学贷款不感兴趣的原因之一。而在很多国家,助学贷款可以由毕业生有望能够获得的高工资进行偿还。但在中国,大学生就业率低,加上现有助学贷款还款期限短,这些因素极大增加了贷款违约的可能性,不仅使得学生不愿意贷款,而且银行也不愿意给他们贷款。

中国可以为那些收入低、且家长不能提供贷款抵押物的学生提供补贴或贷款担保,提高助学贷款的普及率。根据我们的预计,如果助学贷款能够占到学费和生活杂费的33%到50%,家长为子女大学教育而进行的前期储蓄可以降低26%到44%。提高教育的普及率和公平性有着深远的社会和经济意义。与2025年的基准预测相比,中国消费占GDP比例会再提高0.4到0.7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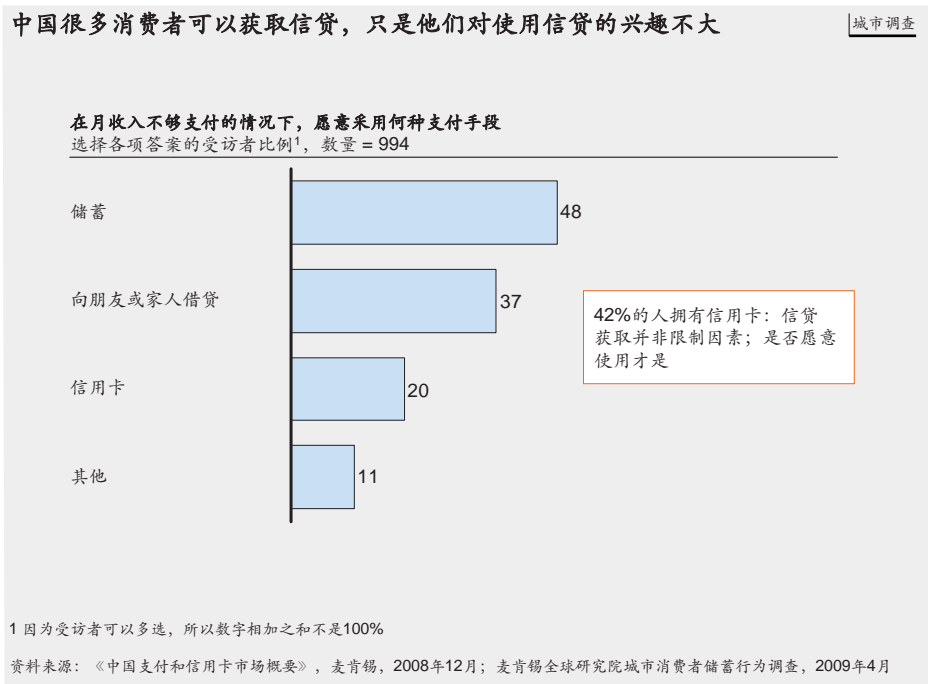
### **扩大非抵押贷款类消费信贷的使用**

中国经济中非抵押贷款未偿消费信贷的比例很低,不到GDP的3%,低于包括亚洲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2007年,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该比例分别为GDP的24%和8%。但我们的研究表明,问题可能不仅仅是信贷的可获得性,还包括信贷的使用。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09年4月的调查中,受访的城市消费者中有42%表示拥有信用卡,自2005年以来,向消费者发放的信用卡数量呈爆炸式增长。信用卡帐户数量从2004年的1100万增加到2008年预计的1.24亿。

但是,信用卡供应的增加可能超出了信用卡使用的增长。很多消费者表示,在购买大额商品时,他们更愿意使用存款,或者向亲属借钱,也不会使用信用卡(图22),他们更不愿意在信用卡账户上留有帐务余额。中国消费者使用信用卡进行的交易量仅占交易总量的6%,信用卡余额占GDP的比重还不足0.1%。

消费者使用信用卡频率较低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信用使用的基础设施虽然发展很快,但仍然处于发展初期。直到2006年中国央行才成立首个征信管理局,虽然在该系统中注册的消费者有6亿多,但仅有一小部分(2008年有7000万)拥有信用记录。中国的支付基础设施亦处在发展初期。2005年以后商家才广泛接受信用卡付款,从40万家增加到现在的118万家,几乎增长了两倍。

图22



上述事实表明，中国已经制定了大部分所需的政策，提高非抵押贷款类消费信贷的使用，目前正处在消费信贷起飞的拐点。为此，我们的政策情景假设，在无需额外具体政策行动的情况下非抵押贷款类未偿消费信贷将大幅增加，到2025年达到其他亚洲国家的水平。自2005年以来，信用卡交易量和信用卡循环借贷的增长说明，到2025年前，未偿信贷额将占GDP的9%，相当于香港2007年的水平。我们最佳情景的分析使用了更快的增长率，到2025年，未偿信贷将占GDP的15%，比台湾2007年的水平还稍高一些。

根据我们的分析，到2025年，非抵押贷款类未偿信贷占GDP的比例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消费占GDP的比例将增加约0.1%。因此，在政策情景和最佳情景中，到2025年，消费占比将分别增加0.6至1.2个百分点，使GDP提高1.1%到2.4%。

## 到2025年之前，改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对消费占GDP比例的影响十分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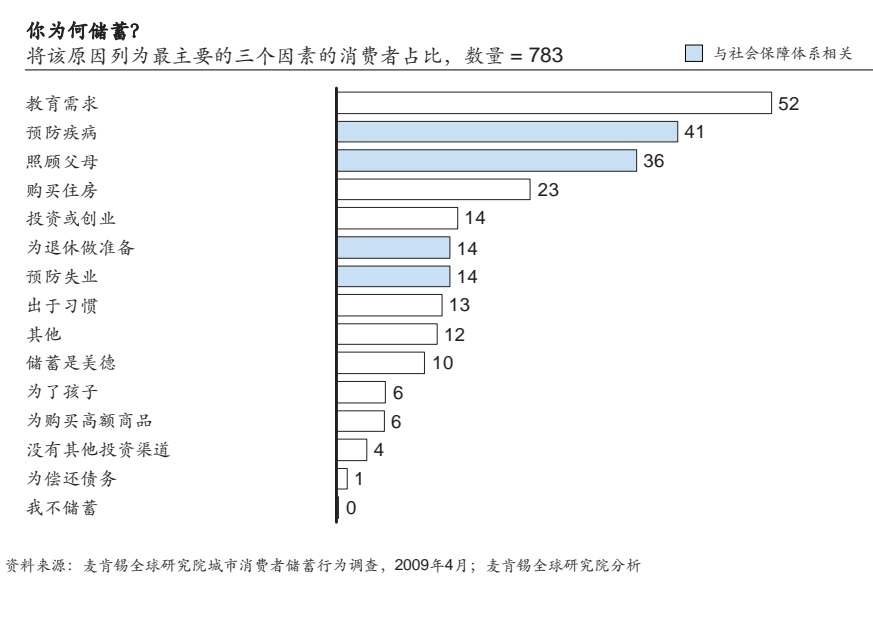
这组政策包括可以将提供基本社会保障的负担从家庭转移到政府的一切举措。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后，“铁饭碗”制度开始被打破，中国家庭开始将越来越多的收入用于医疗和养老相关的费用。同时，中国人将可支配收入中越来越高的比例储蓄起来，这说明中国家庭预期未来对此类的需求会更大，且日常收入无法承担这些费用。今天的高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将来在社保支出上的赤字（见副文2：社会保障体系和消费者储蓄）。

副文2:社会保障体系和消费者储蓄

中国家庭居高不下, 日益增长的储蓄率反映了一个清晰的模式, 即人们认为未来社保相关成本将继续增长且对未来的费用抱有很大的不可预见性, 从而进行自我保障。根据2009年4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对1200多名中国城市消费者进行的调查, 未来教育成本是他们进行储蓄的最主要考虑, 其次分别是患病的风险和赡养老人的相关费用(图23)。尽管有些家庭实际上无需为了一段时间的疾病或保持退休后的生活水准而花费储蓄, 但他们还是为了这种可能性而进行储蓄, 这反映了家庭出现意外疾病或在医疗费用上涨后, 他们可能遭遇到的严峻经济压力。

图23

与社会保障体系相关的问题是影响中国消费者储蓄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方面的政策行动需要对中国的政府、金融和法律体系上作出一些结构性调整, 且需要大幅增加政府和企业开支, 从而补充或代替目前的消费者支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此类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起到重新分配的作用, 即将部分社保成本从穷人转移到富人, 从个人消费者转移到政府和企业, 并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从富人重新分配给穷人, 从企业重新分配给家庭。由于更多消费者支出也会伴随着更多政府开支, 因此我们认为到2025年, 此类政策对消费占比的拉动效果相对较小。

当然, 改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步骤, 其影响不仅限于刺激消费。从根本上讲, 不管社保支出来自政府还是消费者, 社保支出的增加都代表经济的增长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更广的角度而言, 社会保障体系的改善将确保所有国民——无论他们的收入水平、户口状况和地理分布如何——都能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获益。扩大社保覆盖范围将有助于缓解中国目前因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不



稳定因素。从长期而言，为更多中国人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健康高效的社会，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增长和经济的长远发展。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改善中国社保体系将从三个方面影响消费。短期而言，总体支出的增加，无论来自个人、政府还是企业，都将刺激医疗保健和其他相关类别的消费。中长期而言，这将减少预防性储蓄，且有可能降低家庭的储蓄率。长远来看，通过全面提高国民寿命、健康水平和福利状况，有助于中国提高生产效率。

在本章节中，我们对宏观经济的第一种和第二种影响进行了评估。我们假设第三种影响或者出现在本报告的下一章节中，即主要讨论中国经济结构性变革以及向服务业和高附加值行业转变所带来的影响；第三种效果的影响也可能发生在2025年之后，超出了我们研究的时间范围。我们研究的重点仅限于对中国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由上至下的分析。<sup>16</sup>

总之，全面扩大和改善中国医疗保障和养老金制度的这套政策可在2025年将消费占GDP比例提高0.2至1.1个百分点，个人消费将达到4800亿到1.9万亿人民币，比基准预测增长1.6%到6.3%，年人均消费增加300元到1300元。总体而言，到2025年，这些措施对GDP的贡献将比基准预测高出9000亿到2.4万亿人民币，即高出约1.6%到3.4%。

## 中国可以控制快速增长的个人医疗费用支出

中国的总体医疗保健支出相对较低，2008年仅占GDP的4.8%，低于当今西欧国家的医疗保健占GDP9.2%的平均值和经合组织8.6%的平均值。尽管中国医疗保健支出占GDP的比例在近几年来增幅不大，但稳定的份额加上GDP快速增长意味着医疗保健费用的绝对值和其相对于家庭收入的比例在迅速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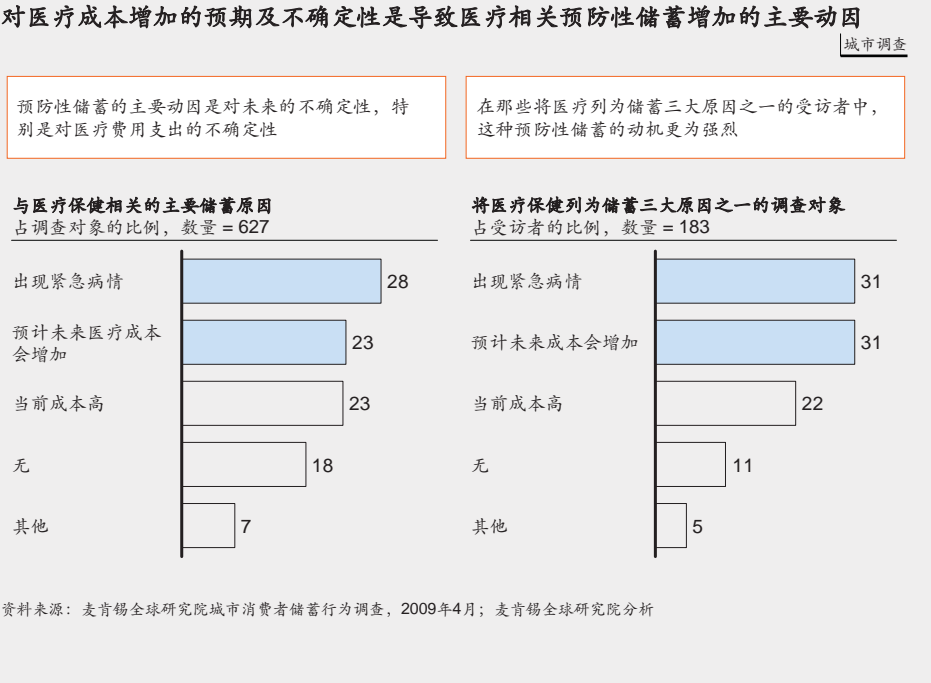
而且，中国消费者个人负担医疗保健费用的压力远高于很多其他国家。2008年，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占医疗总支出的45%，虽然这和其他亚洲经济体相比不算特别高（亚洲各经济体平均值是44%），但发达国家的个人负担比例较低。例如，西欧国家平均个人负担费用占总医疗开支的25%，而亚洲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比例是18%。对中国城市家庭的基准分析说明了这种负担将如何快速的增长。如果继续这种趋势，到2025年个人负担的医疗保健支出将占中国城市居民总消费的14%，而目前是10%。

为了降低中国国民在这方面的经济负担，中国政府需要更多地承担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费用。但是，如果中国医疗保健体系的质量差强人意，这一变化将不会对消费者这方面的预防性储蓄带来实质性的影响。除非医疗体系的质量能够提高，否则消费者将继续自掏腰包，并为此储蓄，以获得更好

16 尽管我们最初在分析中包括了其他两个因素（教育和失业补助），后来我们认识到教育应属于“直接刺激消费”的政策范畴，因为这个问题主要是如何支付相对明确且可预测的费用。我们还发现尽管失业补助属于社保保障范畴，但其规模太小，和医疗保障和养老金相比可忽略不计。

的医疗保健服务。担心未来生病和怕支付不起未来的医疗费用是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动因（图24）。

图24



如果政府既能够大幅增加医疗保健的总体支出，又能够控制家庭医疗保健支出的增长，那么我们预计针对医疗费用的储蓄会降低。总体支出很可能要远远高于目前4.8%的GDP占比，才能让消费者愿意减少储蓄。

这一估值结果的一部分来自于对比台湾的情况。台湾地区出现过和中国内地类似的发展模式。起初，台湾的医疗保险覆盖率较低（1994年覆盖率为57%），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居民都拥有医疗保险（1998年的覆盖率是97%）。学术研究表明，推出全面医疗保障体系后，受益的居民家庭储蓄率降低了2.2%到3.7%。<sup>17</sup>当然，虽然个人储蓄需求在台湾地区出现下降，但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实现了几乎全面的医疗保障后，医疗保健支出继续快速增长，其占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5.8%增加到2008年的6.2%。

直到2003年，中国仅有30%的居民拥有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险。调查显示，没有医疗保险的消费者比拥有医疗保险的消费者要多储蓄将近50%的可支配收入。在过去的6年中，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迅速扩大，现在至少75%的人口已经拥有一定形式的医疗保险，而中国计划进一步提高这一比例。尽管保险方案的保障范围和质量不尽相同，但根据2009年4月所公布的医改方案，中国要在2012年之前，将医疗保险覆盖到90%人口，并计划推出一系列改善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和服务质量的举措。

17 Chou, Shin-Yi, Jin-Tan Liu, 和James K.Hammitt著,《国民健康保险和预防性储蓄：台湾例证》，《公共经济学杂志》，2003年，87卷（9月9-10日），1873-94页。

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宣布到2025年以后的政策，我们使用了国际对标得出了最佳情景，来研究对2025年消费的潜在影响。我们假定届时中国将达到西欧的水平，即总体医疗保健支出占GDP的9.2%，同时个人支出和政府支出的分配比例为25%和75%。在中国，这会使消费占比高于基准0.6个百分点，中国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水平达到当今的斯洛文尼亚和葡萄牙的水平。

我们的政策情景是基于当前政府的计划作出的，采用相对保守的方法。政府计划在2009年到2011年之间，增加医疗保健支出8500亿人民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到2011年之前，即使医疗保健费用的总支出占到GDP的5.4%，中国政府增加的开支也可以将个人自行负担的医疗费用减少到总量的37%。如果我们假设到2025年，家庭支出总额和最佳情景下的相同，但是政府的政策将个人负担医疗费用从总费用的45%降低到了37%。这也意味着，总体医疗保健支出占GDP的6.2%（类似于今天台湾地区的水平），消费占比将提高0.4个百分点。在这种情景下，中国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可以达到现在捷克共和国的水平。

### 中国可以通过扩大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提高可靠性和效率来刺激消费

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正处于从“铁饭碗”过渡到由政府（而不是企业）提供福利和监督管理的新制度阶段。这一体系面临着很多挑战，针对这些挑战我们找到了三套政策。虽然政府已经在实施其中的一些政策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其他的政策给予足够的重视。

1. **扩大养老保障的参与度和覆盖面。**目前，中国大约有40%到50%的职工参加不同形式的养老金计划，覆盖到城市居民、农村人口和公务员。但是，各类人口间养老金的覆盖程度差异很大。将近90%的城市居民已经参加了养老金计划，但农民工和农村人口的覆盖率仅在20%到25%之间。根据基准情景，到2025年之前，大约有60%的职工将参加保险，这比世界银行在2005年的预测还要悲观一些，世行估计中国需要大约50年的时间实现90%的养老金覆盖率。<sup>18</sup>我们的政策情景和最佳情景的基础是政府在2020年之前实现养老金覆盖60%农村人口的目标，并假设农民工的覆盖率将跟上农村人口的覆盖率。在两种情景下，我们估计到2025年之前将实现85%的养老金覆盖率（农村人口和农民工的覆盖率为80%，城市居民覆盖率为95%）。这也反映了中国政府近几年扩大养老金计划参与度和覆盖率的决心。
2. **集中化管理和集资。**中国首次修改养老金制度是在国有企业政企分开改革之后，养老金计划曾经在市级层面进行管理。每个城市负责征缴、统筹并监督养老金给付到该市拥有户口的退休职工。但是随着流动人口的大幅增加，这一系统面临巨大压力。首先，流动人口对该系统失去了信心，因为他们必须向所在城市交付养老金费用，但却因为没

18 沈懿敏，《中国：养老金负债和养老保险的改革选择》，世界银行，2005年5月



有户口而无法加入这个城市养老金计划。其次,各城市不能履行其养老金的义务,是因为它们不能进入全国统筹的养老金资金库,例如如果某个城市出现养老金账户盈余,但由于缺乏全国性统筹系统,其他城市也不能共享。第三,各个市政府要负责行政和管理人员的费用,造成规模效率低下。最后,中国到目前为止未能抓住养老金统筹管理后,实现高额回报的机遇(假设此类投资的限制会被解除)。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自2000年以后,尝试将养老金转变为省级管理的制度。虽然计划在2009年前完成这个转变,但尚未实现,且关于何时能够实现尚不明确。即使在2025年之前完成这项转变也是对现状的显著改善,而最理想的情况则是实施全国性的养老金体系。

3. 减少资金缺口。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在目前的状况下,养老金体系面临的财政缺口达到GDP的65%到94%。原因来自多方面,包括相对年轻的退休年龄、人口寿命延长、养老金缴费率较低(估计占应缴数额的70%),人口的迅速老龄化(中国的抚养比例将从现在的35%增加到2012年的50%以上,到2035年将增加到100%以上)以及养老金的低回报率(相当于投资一年期储蓄的利息回报)。在过去的十年内,政府开展了两个养老金改革试点项目,但是没有包括解决养老金资金不足根本原因的措施。至今为止,虽然解决养老金资金缺口的紧迫性日益增加,但没有迹象表明政府对此有任何方案。

最终,中国需要探讨更加全面的改革,但是现在的改革仍集中在扩大覆盖率上,这本身将产生几个影响。首先,降低参与职工的预防性储蓄,并最终刺激退休职工的消费。其次,这将减少加入养老金计划职工的收入,因为他们需要按照工资的比例进行缴存;当其他条件相同时,在获得养老金的同时,他们的实际所得收入将减少(详细说明请参见技术附录)(图25)。第三,这将增加成本,减少企业利润,降低企业投资。上述三个因素的综合效果是个人消费的增加,以及消费占GDP比例的增加。需要指出的是,扩大养老金覆盖率实际上起着强制职工储蓄的作用。如果预防性自愿储蓄没有相应降低,消费有可能低于基准情景的预期。

根据我们的政策情景,由于假设扩大养老金覆盖面将对收入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以及GDP将略低于基准预测(详细情况请参见技术附录),到2025年可将消费占比拉低0.2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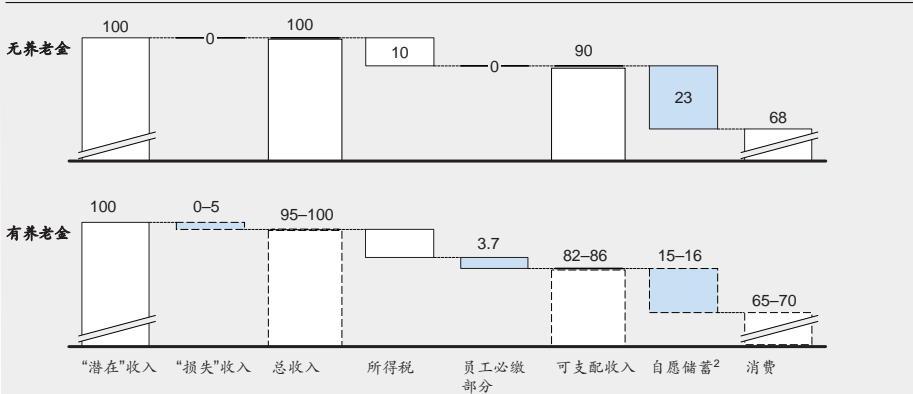
但是我们认为,如果养老金体系的效率和可靠性得到提高,获得养老金的职工的预防性储蓄率将降低。存钱防老是当今中国居民的主要储蓄原因,我们的调查显示,无养老金职工与有养老金的职工相比,储蓄占其收入的比例平均会高出三分之一(图26)。很多加入养老保障体系的职工仍然储蓄,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体系不够可靠。所以,提高养老金体系的可靠性对无养老金职工的储蓄行为影响最大,甚至有养老金职工也会调整他们的储蓄,但前提是他们相信养老保障体系的支付能力。

我们的研究发现,同时扩大养老金的覆盖面和提高养老保障体系的可靠性,到2025年可将消费占比最多拉动0.5个百分点,这是因为用于养老的预防性储蓄减少了,获得养老保障的员工消费增加了。同时,我们认为由于养老金覆盖面的扩大对增加了政府和企业的成本,投资将比基准预测降低1到2个百分点。

图25

加入养老金计划将对消费产生直接（因收入减少）和间接（因改变储蓄行为）的影响

两名情况相同工人的收入及消费对比  
占平均总收入的比例<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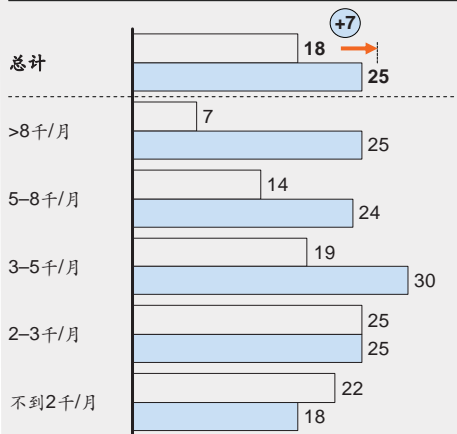
1 假设有养老金和无养老金的人员总体收入水平相同（其他情况我们没有相关数据）  
2 自愿储蓄 = 人民币总储蓄额除以“潜在”人民币收入，因此有养老金人员的自愿储蓄比储蓄率稍低  
注：因四舍五入，数字之和不等于总数

资料来源：文献研究；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城市消费者储蓄行为调查，2009年4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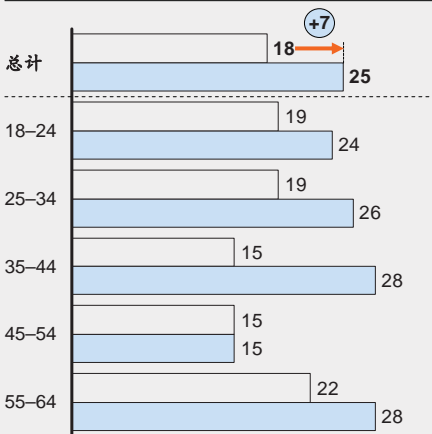
图26

调查表明，没有养老金的员工要比有养老金的员工多储蓄三分之一，这与收入

按有无养老金和所报家庭可支配收入划分的总体储蓄率  
占已知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数量 = 683



按有无养老金和年龄划分的总体储蓄率  
占已知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数量 = 632



资料来源：麦肯锡《中国支付与信用卡市场概览》，2008年12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消费者储蓄行为调查，2009年4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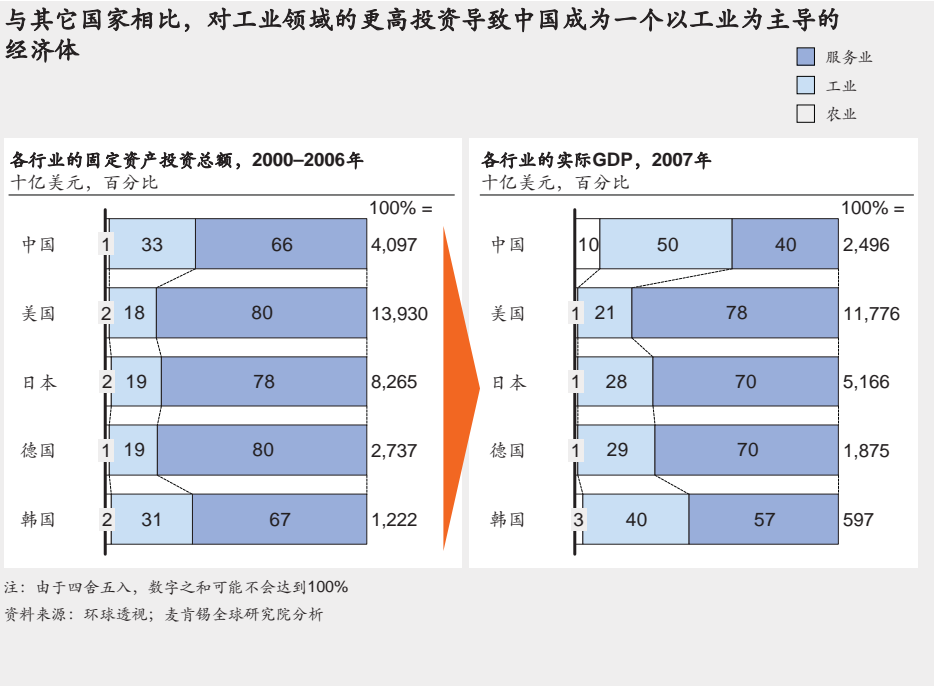
旨在提高家庭收入的结构性改革将进一步提升消费占比

这组政策包括一系列广泛的措施，将影响到金融体系、产业政策、国际贸易以及中国经济政治的方方面面。这些举措对消费占GDP的比重影响在本次研究的时间范畴内比较有限，因为主要相关政策涉及到中国经济格局的根本变化。实施这些变革所需的时间和努力，较之于本报告详细阐述的其他两类举措，完全属于不同的数量级。但是中国如果要成功转型为消费拉动型的经济模式，这些举措最为关键，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起到最深远的影响。

我们认为，最快到2025年，中国将大规模向服务业转型，来自股息、银行存款、房地产租赁收入等非工资收入的较高增长将拉动消费占比增加3.5到6.0个百分点。家庭的平均收入将获得10%到20%的增长（欲了解所使用的方法，请参见技术附录）。

**向服务业转型将增加就业，刺激消费。**中国投资长期以来侧重工业部门，但工业部门在创造就业机会和效率上的表现一直不如服务行业。中国大举投资工业，造成了比其他国家更为偏重工业发展的经济发展格局（图27）。中国政府的高层意识到，将投资从资本密集型行业转向效率更高、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能够在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和刺激内需上取得乘数效应。在十一五计划中，政府适时提出了大力发展服务业的目标，即将经济中的服务业比例从2005年的40%的基础上提高3个百分点，将服务业创造就业的比例提高4个百分点。尽管目前的金融危机促使政府在短期内重视出口导向型经济和重工业，但陆续出台的发展IT业，建立外包能力以及支持中小型企业发展的举措表明，中国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目标保持不变。

图27



这一目标对中国总体经济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中国资本密集型行业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从农业吸纳了数百万劳动力，但是它可能不再能够继续吸纳2008年到2025年之间预期还要离开农业的1.9亿劳动力。服务业需要填补工业型经济遗留下的就业缺口，并能够提高就业人员的收入。

如果中国能够支持那些有潜力创造就业机会的行业，并可以通过增加工资来刺激消费，那么到2025年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可接近49%。如果维持现有趋势，则只能达到45%。如果2010年以后，政府能够将服务业比重每5年提高3个百分点，到2025年就能实现服务业占比49%的目标。这个幅度不大的转变可将平均家庭收入比基准情景提高9-10%，这是因为服务业的就业增长较快，生产效率的提升将推动工资的增加。但是因为必要的投资会略微增加，部分抵消了消费的增长，所以消费占比只会增长1-2个百分点。

如要更大幅度地向服务业转型，则需要服务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相应地需要重新分配投资资金。世界银行的Louis Kuijs和Bert Hofman在2007年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技术性的推测，认为中国的服务业比重到2025年之前将达到54-55%。<sup>19</sup>但是要达到这一水平，我们估计中国近70%的投资要用于服务业，而且服务业不仅需要吸纳在基准情景下工业部门本应创造的1.7亿个就业机会，还需要额外创造5000万个就业机会。而且，服务业创造的就业机会的数量还须考虑竞争政策所带来的生产力增长。

如果中国能够完成这一转型，经济格局则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服务行业的就业人数占适龄劳动人口的比例将从基准的36%提高到将近60%，但工业部门产出依然保持强劲增长，会略有所放缓（2008年到2025年的复合增长率是5.6%。基准情景的复合增长率是7.5%）。

因此，中国的工业部门必须要创造出高于基准的生产率增长（复合年增长率需要达到2.9%，而目前基准的复合年增长率为1.6%）。服务业生产率需要实现3.4%的复合年增长率，略微低于4.4%基准预测（尽管比基准多增加将近2.2亿就业机会）。实现这样的生产率增长需要大幅提高劳动力收入，并显著改善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长。

**提高家庭收入中投资类收入将推动消费占比的增加。**中国居民来自银行存款利息、股息、房地产租赁等投资性收入占家庭平均收入的不到2%，低于其他国家。而且最近几年投资性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并无增长。虽然中国GDP增长速度惊人，金融资产的实际回报率只有0.5%，而韩国和美国实际回报率分别是1.8%和3.1%。<sup>20</sup>

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将有助于中国提高金融部门的回报率，不仅可以增加居民收入，还可以刺激消费。到2025年，投资性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

19 Bert Hofman和Louis Kuijs,《重新调整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在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举行的中国汇率政策研讨会上的发言，2007年10月19日

20 《令中国资本运转：金融体制改革的价值》，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06年5月（[www.mckinsey.com/mgi](http://www.mckinsey.com/mgi)）

点,消费占比将相应提高约0.3到0.4个百分点。例如,如果投资性收入占平均家庭总收入比例从1.7%提高到3.4%,则消费占比将增加0.7%。如果提高到5.1%,消费占比将增加1.2%。

导致中国投资性收入较低的原因有很多,主要与中国不发达的资本市场有关。中国可以改革国有企业的股息派发政策,鼓励开发更多的金融工具,让更多的中国家庭参与金融市场,来实现非工资收入的增加。这些方面的政策将鼓励企业采取更加明智的投资决策,让家庭分享企业创造的利润,从而促使资金向居民个人的重新分配。

实际上中国已经开始了金融体制的改革,推出的很多措施将有助于解决个人投资性收入较低的根本原因。但是,上述改革尚未全部按计划落实。中国必须考虑扩大其银行和资本市场开放与发展计划上的范围尺度,从而实现向消费拉动型的经济转变。

现在我们需要对以下三大政策进行讨论,包括势在必行的金融业改革,这样才能成功地1) 向服务型经济模式转变;2) 改善收入增长,一方面通过总体工资水平的快速提升,另一方面通过提高资产回报率,增加投资性收入。

#### *鼓励金融业的改革*

到目前为止,中国金融业改革在两个方面收效有待提升。首先,金融行业将资金分配给低产出、低效率的企业(主要是工业企业)。为了成功向服务业转型,必须改变这种资金分配的状况。其次,目前的金融体制决定了中国储户的收益很低,限制了收入增长。

2007年,中国的金融总资产增长了56%,分别超过德国、英国和法国,成为全球规模第三大的金融市场。就在2002年,中国金融市场仅排在全球第七位。从2002到2007年,中国个人投资者的金融资产规模增加了140%。虽然增长速度惊人,但中国的金融市场将资金分配给产出和效率较低的企业,导致投资效率的下滑。<sup>21</sup>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之前的一份报告,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中国需要投资3.30美元才能增加1.00美元的GDP。但是到了2001年,中国需要投资4.90美元的投资才能增加1.00美元的GDP。这比亚洲“四小龙”在其经济腾飞阶段生产相同GDP所需的投资还高出40%。该研究还发现,如果大部分资金流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中国每年最多可拉动GDP增长2590亿美元,即增长13%(参见副文3)。如果在考虑到国内银行达到国际的运营效率标准和改善融资工具组合前提下,则每年可拉动GDP增长3210亿美元。

上述金融有关的因素,加上中国控制利率上限和限制企业股息,为消费增长带来了压力。

21 《令中国资本运转:金融体制改革的价值》,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06年5月

### 积极开展行业整合，提高行业效率

中国进行产业整合的空间很大，特别是像钢铁和水泥等较成熟的行业。行业整合有利于生产率的提升。中国已经出台政策，鼓励钢铁行业整合，关闭低效的熔炉，使用更加清洁的新技术。中国目前已设定，要将前十大钢铁厂的产业份额从2005年的38%提升至2010年的50%，进而提升至2020年的70%。

提高效率至关重要。中国前1000家高耗能企业的整治项目已经开始降低企业能耗，所以有可能借助该项目良好的发展势头，扩大参与的企业数量，制定更加严格的指标。该项目是政府的目标之一，旨在将中国的能耗在2005到2010年之间降低20%。该项目规定了每家参与企业2010年的能耗目标。2004年，中国前1000家企业的能耗占全国能耗的33%，占工业能耗的47%。除了能源之外，水、煤、土地和资金等稀缺资源经常以低于市场的价

### 副文3:中国的资金分配问题

资金分配是一个主要问题——部分原因是中国发展偏重工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2006年，中国民营企业对GDP的贡献率是52%，但仅获得27%的贷款。国内银行在运营上尚不完善，但却掌握了经济中近75%的资金，几乎是亚洲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银行业所掌握资金数量的两倍，而且这些国内银行一般不愿意向民营企业贷款。一部分原因是银行很难获得这些公司高质量的信用资料。中国于2006年才成立首家央行征信管理局。此外，这些银行缺乏贷款定价、信用评估和风险管理上的技能。因此，银行几乎毫无例外地放贷给低风险的国有企业，因为他们规模大、且有政府支持。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也滋生了风险规避的文化，继续导致资产的分配不当。如果银行拥有更加平衡“真实”的贷款组合，既包括低风险也包括高风险的贷款，它们将获得更高的回报。大型企业缺乏银行以外的其它获得贷款渠道，这也造成了资金的配置不当。尽管近几年中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发展迅速，但规模仍相对较小。2006年，中国股票市场的市值仅占GDP的17%，而其他新兴国家的占比在60%以上。

格提供给工业企业。政府应降低为促进这类产业所提供的直接及间接补贴——比如调整关税、或鼓励更具商业可行性的贷款决策，都将有助于提高资金和资源使用的效率。政府还可以对资源使用建立征税体系，使得企业的成本体系和资金分配机制能够在考虑中国能耗成本的基础上更加准确的定价。

### 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服务业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中小企业的成功发展。目前，中小企业面临一系列市场准入的壁垒及发展阻碍（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一样）。例如，它们需要按复杂的规定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手续、缺乏服务业相关技能



和教育以及融资困难等问题。因此,如果要增加中小企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那么就需要改革工商营业执照办理流程、推出更多支持性的劳动力市场的政策,以及放松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中小企业的改革对中国服务业的最终发展至关重要,很多经合组织国家,以及新加坡、台湾和韩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经验都验证了这一点。



## 4. 结论

中国已经推出一系列措施，将经济向更加消费导向型的模式转变，但是到目前为止，实际效果和潜在影响之间还存在差距。以2008年冬天中国政府出台的4万亿人民币经济刺激方案为例。这次方案主要侧重对高速公路和铁路系统的投资。事实上，4万亿中有89%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仅有8%用于刺激消费，（其余用于提高企业业绩）。尽管在目前经济波动的背景下，短期刺激是必须的，但如果中国政府领导人要推动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就必须考虑出台和上文所述方面相关的一些长期政策。

中国目前增长模式的惯性很强，变革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到2025年之前，要想摆脱目前的经济结构，需要面临很多艰巨的抉择。只要中国的经济结构还是依赖投资，其经济要素还会继续增长。换言之，中国政府拉动消费占比的目标将遭遇强大阻力。而且，一些有可能拉动消费占比的政策属于长期政策，例如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善，在未来15年的时间内可能不会对刺激消费作出很大贡献。

但是，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其速度之快，在世界近代史中尚无二例。可以想象，中国政府可以在本文所描述的政策方面采取更加积极一致的行动。目前的经济环境也突显了摆脱净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紧迫性。

如果到2025年，消费占GDP的比例从今天的36%提高到45-50%，中国年均GDP将比基准预测高8%到15%。经济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例如，由于医疗保健支出、投资及教育补贴的增加，政府的支出将增加9%至19%。中国的贸易顺差将最多缩小40%。和目前趋势相比，中国能够多创造出1000万到5000万个就业机会（主要在服务业），推动平均家庭收入增长10-20%（主要因工业部门向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部门转变）。以2000年人民币的实际价值计算，年消费额将比基准预测高出8至15万亿人民币。

对全球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将在全球经济中成为更具影响力和活力的经济体。到2025年中国占全球的消费比例将增加到11%至13%，而按照目前趋势且政策不变的前提下的该比例仅为9%。这也说明，中国将占到未来的15年内全球所有新增消费的四分之一以上，同时促进全球消费者需求增长10个百分点以上。<sup>22</sup>

对中国而言，成功向新的增长模式转型可以带来很多利好：经济抵御海外不利因素冲击的能力增强，效率水平更高、家庭收入提高、经济更加成熟稳健。通过量化不同政策领域内各项举措刺激消费的潜力，本研究尝试找出一些中国可以考虑的重点领域，推动经济全新的、更有活力的发展。

---

22 本计算假设从2008年至2025年全球实际GDP年均增长为2.9%。

# 技术附录

本部分内容将详细说明我们在评估有关政策措施影响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和步骤,并深入介绍报告第三章中各项政策措施对中国宏观经济和GDP组成要素的整体影响。

## 三类政策对GDP及其组成要素的影响

针对每项举措,我们分别估算了它们对个人消费、投资和政府开支的增量影响,并且将其与基准预测数据对比。基准预测则是根据环球透视对中国GDP的预测及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预测模型所得到的(表1)。

表1: 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基准预测					
核心假设	单位	1990-2008年复合 年增长 率, %	2008年 估 算值	2008 —2025年 复合年增长 率, %	2025年 预测值
国内生产总值	10万亿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10.3	22, 368	7.7	78, 508
个人消费	10万亿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8.2	8, 011	8.1	30, 343
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	%	-15.1 个 百分点	35.8	+2.9 个百分点	38.7
固定资产投资	10万亿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13.6	8, 674	7.6	29, 960
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	%	+16.0 个 百分点	38.8	-0.6 个百分点	38.2
政府消费	10万亿元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10.2	3, 122	8.6	12, 699
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	%	-13.0 个 百分点	53.7	-6.8 个百分点	46.9
每户家庭储蓄率占平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	+14.4 个 百分点	25.1	-8.4 个百分点	16.7
汇率*	人民币兑美元	无	6.947	无	5.884

\* 尽管考察中国汇率政策调整的原因和影响不在本研究的范围之内，基准预测确实包报人民币的轻微升值。在进行政策和最佳情景分析时，我们假设汇率与基准情景的相同。之所以在此处列出，是为了说明我们在分析时所考察的对象。

为了估算各项政策对个人消费在GDP中占比的影响，我们需要首先确定这些政策措施对GDP的整体影响，因为这些政策的实施将同时影响个人消费占比中的分子和分母。

前文曾提到，我们的研究基于比较静态分析。既不使用一般均衡模型计算对GDP的影响，也不考虑GDP和通胀、利率、汇率和其它金融变量之间的潜在联系。尽管这些因素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但预测其变化轨迹不在本次研究的范围之内。因此，报告的正文特别指出，我们的研究结果不应被视为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预测，而是基于对比政策实施与不实施这两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政策实施的潜在影响进行评估。

总之，通过对八项政策措施的分析，我们得出了它们累计对个人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原则上，个人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中一部分会被用于国内、创造GDP；另一部分则流向国外，用于最终产品或中间产品的进口，这将降低贸易顺差和GDP。我们使用了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发布的2005年投入产出表（这是开展研究工作时能够得到的最近一个年份的投入产出表），分析消费、投资或政府支出平均每增加1美元所带来进口和国内支出的增长。研究发现，平均有17.9%的个人消费和18.4%的投资用于进口。政府支出则更多地以国内为主，仅有2.8%用于进口，而出口所占比例则高达46.3%，说明再出口的水平较高。

我们从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增加额中去除了用于进口的那一部分，把剩余部分对GDP各要素所造成的影响加总，计算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增加对国内开支的间接影响（即增加支出可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工作机会增多可提高收入，进而扩大支出）。项目小组使用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模型测算了GDP对于各支出项目变化的敏感度，从而得出了乘数。结果显示，不同时期的乘数效应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将采用2008-2025年的平均乘数进行分析预测。由此得到的消费乘数是1.66，投资乘数是1.63，政府支出乘数是1.20。这意味着什么呢？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消费乘数是1.66，那么消费者开支每增加1元，GDP就会增加1.66元。

我们将各项支出的乘数效应加总，剔除直接影响部分，然后将剩余部分按照当前各项支出在GDP中的占比进行重新分配。为了计算净出口的变化，我们将出口保持在基准预测水平，按照进口漏损分析结果提高了进口数据，由此减少了贸易顺差。在考虑了支出增加所产生的初步影响、进口漏损和间接乘数效应后，我们得到了这些政策对GDP的最终影响。

报告的主体部分重点讨论了八项政策措施各自可能产生的影响。以下内容将就我们所采用的分析方法进行详细介绍。

## 直接刺激消费

### 改善消费基础设施, 提高产品质量, 扩大产品供应

2009年2月至4月, 另一支独立的麦肯锡项目组以部分中国和外国城市为基准, 评估了一系列短期政策举措对消费的潜在影响。这些政策举措主要是针对一些具有增长潜力的产品和消费领域。该项研究发现了改善消费基础设施的五种方法和识别最富潜力产品类别与消费品类的三个标准。我们在分析过程中借鉴了该项目组的成果, 以估算此类措施对宏观经济和消费占比的长期影响。在某些情况下, 该项目组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本次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相同。为了防止“重复计算”, 我们在研究中将此类方案予以排除。该项目组提出的改善消费基础设施的五种方法如下:

- 完善零售业基础设施
- 强化产品质量管理
- 健全服务基础设施
- 鼓励搭建新型平台
- 鼓励信贷的使用

鼓励信贷的使用和改善服务基础设施与我们就非抵押类消费信贷和促进服务业发展的结构性转变的分析有重叠之处, 因此, 我们将这两项排除, 着重考察剩下的三种方法, 并且将其做为第一类措施。

对于剩下的三种改善消费基础设施的方法, 我们确定了消费支出的13大重点品类, 主要看这些消费品类是否满足以下三个标准: 消费规模、与国际对标相比刺激消费的潜力, 以及实施的可行性(基于国内城市之间的对比)。我们根据标杆为每个品类设定了一组人均支出目标, 并且计算出消费不足的城市和省份达到消费目标所增加的消费总量。这些城市和省份可以在供应链上下功夫, 比如改善产品供应、分销网络、质量保证等, 同时辅之以其它拉动消费的措施, 以达到上述目标(表2)。

表2: 创造并拉动消费: 宏观经济影响				
主要指标	单位	基准情景	到2025年之前, 仅靠这一政策所能产生的影响	
			政策情景	最佳情景
国内生产总值	10万亿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	78, 508	80, 467 (+2.5)	80, 467 (+2.5)
个人消费	10万亿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	30, 343	32, 248(+6.3)	32, 248 (+6.3)
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	%	38.7	40.0(+1.3)	40.0(+1.3)
人均消费	千元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21.1	22.4	22.4

拓宽消费信贷渠道, 提高消费信贷使用

住房: 扩大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使用

增加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使用可以减少住房储蓄, 从而影响消费 (表3)。我们估算了2025年前的房屋销售总量, 分析在不同情景下个人储蓄和住房抵押贷款各自占房屋销售总价的份额, 就可以估算出通过更多的使用抵押贷款所直接减少的个人储蓄总量 (这不同于其他研究中人为设定了对储蓄率的影响)。



表3: 扩大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使用: 宏观经济影响				
指标	单位	基准情景	到2025年之前, 仅靠这一政策所能产生的影响	
			政策情景	最佳情景
国内生产总值	10万亿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78, 508	79, 280 (+1.0)	80, 822(+2.9)
个人消费	10万亿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30, 343	31, 093(+2.5)	32, 592(+7.4)
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	%	38.7	39.2(+0.5)	40.2(+1.5)
人均消费	千元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21.1	21.6(+2.5)	22.6(+7.4)

在这种方法中, 我们首先根据中国GDP增长与住房市场增长之间的历史联系, 对未来城市住房销量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 到2025年, 年房屋销售总额占GDP的比重将达到13.5%, 相当于美国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水平。然后, 按照中国当前的住房抵押贷款渗透率 (52%) 和平均贷款与房屋价值比 (46%), 计算出要达到上述购买量所需个人储蓄的基准值。

因此, 我们的基准情景是保持现状不变。研究显示, 自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住房私有化效果初步显现以来, 这些数字基本上没有改变, 直到最近都是如此。说明住房市场和整体经济已经在目前的增长轨迹上运行 (由此得到了基准预测), 住房抵押贷款的使用并没有带动消费增长。现在, 我们看到抵押贷款的使用大幅增加, 且预计在不远将来还将继续保持增长。

所以, 在政策情景和最佳情景中, 我们假设抵押贷款的使用大幅增加将有助于削减个人储蓄, 并低于基准预测值 (表4)。为了预测在住房贷款使用增加的情况下购房所需的初期存款, 假设2025年前住房贷款渗透率是62%-78%、贷款与房屋价值比是52%-65%。这就意味着, 房屋销售款的32%-50%将通过贷款融资, 高于当前的23%。我们也由此得到了政策情景和最佳情景的结果, 并与基准预测进行比较。将这些假设与国际标杆对比的结果显示, 中国在2025年前将赶上一些经济体目前的水平, 如韩国 (房屋销售总价的35%通过贷款支付)、香港 (50%)、美国、日本和新加坡 (均在65%左右)。

表4: 房地产市场假设			
核心假设	基准情景	政策情景 (到2025 年之前)	最佳情景 (到2025 年之前)
房地产市场年交易总额, 万亿人民币 (名义值)	22.8	22.8	22.8
购房开支中贷款的比例, %	23	28	51
住房抵押贷款渗透率: 使用住房贷款的购房者所占比重, %	52	52	78
平均贷款与房屋价值比: 住房抵押贷款价值与所购房产总价的比率, %	46	53	65

当然, 如果说提高贷款与房屋价值比将促进消费, 我们就需要做出另外一个主要假设。鉴于购买同一房屋所需前期支付费用有可能降低, 一些购房者也许会减少每月的存款, 购买同样的房屋; 另外一些购房者则保持每月存款不变, 但会提前买房或者买更贵的房。这两种情况对消费的影响是有区别的。如果购房者选择后者, 储蓄可能根本不会下降, 但投资会因抵押借贷人的借贷而增加。

由于没有一个清晰的依据可用于计算做出上述两种选择的消费者各有多少, 出于简化, 我们假设消费者会选择削减存款数额, 而不是把买房的时间提前或者购置更昂贵的房产。最后, 我们将储蓄的减少额看做增量收入, 由此得到每个家庭在2008年到2025年边际消费倾向从75%提高到83%。

教育: 提高高等教育融资

教育与住房的情况比较类似。我们认为增加助学贷款的使用有助于降低专门用于大学教育的个人储蓄 (现在有大约10%的大学生使用助学贷款。在此次研究中, 我们假设10%的大学学费、杂费和书本费通过银行提供的助学贷款, 而不是靠向亲友借钱支付)。只要消费者认识到可以利用助学贷款, 他们的储蓄行为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而降低的那部分用于大学教育的个人储蓄将由银行贷款来填补。<sup>23</sup>

为了预计大学教育成本, 并估算这一成本所需个人储蓄, 我们采用人口统计学预测来确定潜在的大学生数量和提前为子女大学教育进行储蓄的家庭数量 (表5)。尽管中国的大学入学率目前还不到30%, 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对中国城市消费者所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 几乎所有家长 (97%) 都认为自己的子女会上大学; 另外, 还有将近60%的受访者表示每月都会为子女教育存钱。根据一项对教育服务通胀率的预测, 我们计算出了独生子女家庭未来可能需要支付的教育成本, 以及就子女目前的年龄和入学年份来确定每年需要为其大学教育而储蓄的金额。我们认为, 在子女年纪比较

23 我们在分析之初还考虑了大学前教育 (包括农民工用于子女大学前教育的存款, 因为公立学校可能不接收农民工子女) 和成人教育。但是, 与高等教育相比, 用于大学前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个人支出要少的多 (不到个人消费总额的0.1%)。再加上我们的消费者调查显示, 为将来送子女上大学而储蓄的消费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所以在研究中没有考虑大学前和成人教育。

小时,家庭教育储蓄金额也相对较少,日后随着子女年龄增长,距离上大学的时间越来越近,家庭教育储蓄金额会逐渐增加。我们借助人口统计学预测,估算出了准备为高等教育而存钱的所有家庭所需储蓄的总额。基准预测的前提是助学贷款的使用在未来保持不变。

表5: 教育体系假设			
核心假设	2025年前的数值		
	基准情景	政策情景	最佳情景
2008年大学四年所需学费与生活费	40,000元人民币		
2008—2025年学费与生活费的复合年增长率, %	5.0		
为18岁以下子女大学教育而储蓄的家庭所占比重	60%		
助学贷款渗透率, 占学费和生活费的比例	10	33	50

到2025年之前助学贷款渗透率在基准情景中为10%, 在政策情景中假定为33%, 在最佳情景中假定为50%。我们以此为基础计算并对比了在这三种情况下的个人储蓄, 以考察当助学贷款的使用率大幅上升时储蓄的减少量。在这三种情景中, 教育支出总额不变, 但个人教育存款的数量降低了(表6)。

表6: 提高高等教育融资: 宏观经济影响				
指标	单位	基准情景	到2025年之前, 仅靠这一政策所能产生的影响	
			政策情景	最佳情景
国内生产总值	10万亿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78,508	79,146(+0.8)	79,549(+1.3)
个人消费	10万亿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30,343	30,952(+2.0)	31,343(+3.3)
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	%	38.7	39.1(+0.4)	39.4(+0.7)
人均消费	千元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21.1	21.5(+2.0)	21.8(+3.3)

同对住房的分析一样, 我们将个人储蓄减少的部分作为增量收入, 其支出与其它类型的收入没有差别, 都将按边际倾向消费。虽然研究证明, 在一些国家, 助学贷款实际上变成了“隐性助学金”, 向消费者转移收入, 刺激政府支出。我们并没有假设“隐性助学金”形式的学费补助会有任

何增加, 因此我们对助学贷款使用增加对消费影响所做出的预测是相对保守的。

扩大非抵押类消费信贷的使用

历史数据显示, 2003-2008年非抵押类未偿消费信贷占GDP的比重不仅未见增长, 甚至有所下降。基准情景分析显示, 非抵押类未偿消费信贷在未来的增加速度最多与GDP增长速度持平(表7)。然而, 如果中国要达到发达国家、甚至是其它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非抵押类未偿消费信贷必须增加(目前还不到GDP的3%), 从而拉动消费, 使之高于基准预测值。由于非抵押类未偿消费信贷的扩大基本上或完全不需要增加投资或政府支出, 因而消费占GDP的比重也会随之上升。

我们相应地分析了在非抵押类未偿消费信贷增速超过GDP的条件下, 个人消费占比可能发生的变化。在政策情景中, 到2025年非抵押类未偿消费信贷可达到GDP的9% 相当于香港2007年的水平); 而在最佳情景中, 到2025年前这一比例可增至15% (相当于台湾或新加坡在2007年的水平)。尽管这些数据与政府政策在我们的分析中并无特定的关联, 但我们看到一些与之相关的政策调整在近年来已经展开(如成立消费信贷管理局以扩大信用卡的接受程度等), 未来还会跟随一些其他政策的调整而出现更多的变化(如本报告中关于投资的章节中所讨论的金融体系改革)。在我们看来, 中国的消费信贷业可能正处于一个发展的拐点。鉴于目前诸多条件已经具备, 消费信贷的扩大势在必行。

表7: 扩大非抵押类消费信贷的使用: 宏观经济影响				
指标	单位	基准情景	到2025年之前, 仅靠这一政策所能产生的影响	
			政策情景	最佳情景
国内生产总值	10万亿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 )	78, 508	79, 373(+1.1)	80, 429 (+2.4)
个人消费	10万亿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	30, 343	31, 184(+2.8)	32, 210(+6.2)
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	%	38.7	39.3(+0.6)	39.9(+1.2)
人均消费	千元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	21.1	21.7(+2.8)	22.4 (+6.2)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减轻不断增加的个人医疗费用负担

根据现有的详细统计数据（2003年以后），中国的医疗费用总体增长基本上与GDP持平，而且近年来一直较为稳定，保持在4.0-4.5%的水平，医疗费用的40-55%由个人承担（现在大约是45%）。鉴于过去这些数字基本上没有什么波动，我们可以从历史表现推断出基准情景，即到2025年前医疗费用总计将至少占GDP的4.5%，个人支付份额占45%。

根据2009年4月颁布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中国政府计划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提高到90%以上，并加快推进医疗保障基础设施建设，且已宣布2009-2011年拟投入8500亿元人民币用于医改。由于这项资金属新增政府投资，假设个人和社会支出不受影响，那么2012年医疗费用总数将达到GDP的5.4%，个人支付比例则下降到医疗费用总数的37%。2011年以后的情况尚不得而知，因为关于对医疗费用支出总数和个人、政府及社会之间如何划分，政府并未清楚地界定。我们只能用简单的外推法和标杆法分别对政策情景和最佳情景进行分析（表8）。

表8: 医疗卫生假设			
核心假设	基准情景	政策情景 (到2025 年之前)	最佳情景 (到2025 年之前)
医疗费用占GDP的比重, %	4.5	6.2	9.2
个人自付医疗费用占总体医疗费用的比重, %	45	37	25
政府医疗支出占总体医疗费用的比重, %	20	33	40
社会（单位）医疗支出占总体医疗费用的比重, %	35	30	35
2025年家庭储蓄, 百分点	16.7	14.5	12.9

根据最佳情景分析，随着医疗保健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长，到2025年中国的总体医疗费用占GDP的比重达到9.2%，接近西欧当前的水平。由于届时中国的收入仍将低于西欧现在的水平，意味着年人均支出将达到2300美元，相当于目前斯洛文尼亚或以色列的水平。我们还假设，到2025年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比例将下降至25%，相当于西欧目前的水平。

在政策情景中反应了近期出台的医改方案，中国政府认为总体医疗费用中个人承担的份额最多不应超过37%。由于不知道中国政府关于总体医疗费用的目标，仅凭参保率或医疗基础设施投入很难对总体医疗费用做出自上而下的估算。我们假设政策情景中的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份额不是最佳情景中的25%，而是37%。那么，到2025年，总体医疗费用将占GDP的6.2%，个人承担的比例是37%，其余部分基本上由政府（33%）和社会或企业（30%）近似于均摊。



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人的医疗支出将低于基准值，而政府和社会（或企业）的医疗支出则高于基准值。个人用于医疗的支出减少后，多出的资金至少部分可用于购买其它类型的产品和服务。因此，我们把医疗费用减少的那部分称为“再确认收入”，并假设这类收入和正常收入一样按照边际倾向消费。政府在医疗方面增加的投入作为政府消费，相应地在宏观经济分析中予以考量；社会（或企业）在医疗方面增加的投入最终来自企业利润，所以被视为投资减少的部分。

最后，我们假设扩大医保范围有助于减少预防性储蓄，降低家庭储蓄率 and 促进消费。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推出政府主导的医疗保障体系。针对该制度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它使台湾的储蓄率下降了2.2-3.7个百分点。中国大陆的医保覆盖率近几年才开始逐步扩大（2000年的参保率仅有5%；2003年的参保率为30%；2007年的参保率进一步提高到73%），我们假设中国大陆医改的结果与台湾相似，由此推测家庭储蓄率在政策情景下降低2.2个百分点；在最佳情景下，降低3.7个百分点（表9）。

表9：减轻不断增加的个人医疗费用负担：宏观经济影响				
指标	单位	基准情景	到2025年之前，仅靠这一政策所能产生的影响	
			政策情景	最佳情景
国内生产总值	10万亿人民币，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78, 508	80, 223 (+2.2)	81, 145 (+3.4)
个人消费	10万亿人民币，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30, 343	31, 325 (+3.2)	31, 933 (+5.2)
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	%	38.7	39.1(+0.4)	39.3(+0.6)
人均消费	千元人民币，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21.1	21.8 (+3.2)	22.2 (+5.2)

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提高养老保险的可靠性

针对城市消费者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存钱防老是普遍民众储蓄的首要动因。这类储蓄分直接和间接两种。前者是为了满足日后退休生活需求；后者要用于照顾年迈的父母，父母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退休金）。所以，我们在分析与养老有关的政策时，假设养老金制度改善后，到2025年能使个人自愿储蓄大幅降低，并推动消费相应增加。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假设是因为，参保后消费者更加确信退休后的开销不用完全依靠自己的储蓄来承担（表10）。

表10: 养老保险体系假设

核心假设	到2025年之前的数值		
	基准预测值	政策情景	最佳情景
养老保险总体覆盖面, 参保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重, %	61	85	85
参保人员总数, 百万人	526	733	733
未参保人员总数, 百万人	337	130	130
养老保险覆盖面扩大后参保的职工收入一次性减少的数额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	8.3	8.3	3.7
2025年整体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	16.7	15.2	14.2
2025年未参保职工的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	16.7	12.5	12.5
2025年无论在任何情景下都会被纳入养老保险体系的职工的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	16.7	15.9	14.2

不过，退休金并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是来自一个人职业生涯中的强制储蓄。因此，我们在进行分析时将这个因素考虑在内，并认为养老保险覆盖面扩大会造成收入的小幅下降。职工参保后需要交纳养老保险金，可支配收入会因此略微减少，进而对消费形成向下的压力。为了能准确地建立养老保险范围扩大对个人消费影响的模型，我们的分析包含了以下两个因素。

正如在本报告正文部分所简要描述的，扩大中国养老体系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提高参保率，而且还包括该体系自身的可靠性和筹资。所以，我们分析的一大特色就是，即便是那些已参保人员和在政府扩大养老保险范围后可参保人员的储蓄率，也会有小幅度下降。尽管对养老保险体系的可靠性、效率和资金充足情况的改善建模不在本研究范围之内，但是考虑到政府至少会采取某些措施来实现养老保险体系在上述几个方面的提升（例如，政府已经表示将逐渐使养老保险摆脱地方政府管理，实现养老金省级统筹制度，即便这一进程要慢于预期），我们仍然假设这会对所有参保人员的储蓄率产生影响。

扩大覆盖面

为了对整体养老保险覆盖面进行基准预测，我们考察了三类人群的参保率：城镇居民、进城务工者（农民工）和农村居民。近年来，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险覆盖面迅速扩大，2007年将近有90%城镇居民参保。然而，其它两个群体参保率上升的速度较慢。虽然政府设定了宏大的目标，但是2007年养老保险对农民工和农村职工的覆盖率只有大约20-25%（我们在进行研究时所使用的估算值是：农村职工的参保率为16%，农民工的参保率为23%）。为了推测未来养老保险范围在上述三类人群的扩大率，我们假设

在基准情景中整体覆盖率是61%，即2025年前城镇居民的参保率为93%，农村人口和农民工的参保率是45%。这样，基准预测显示职工的参保人数将从现在的2.89亿增加到2025年的5.26亿，新增参保人员将近2.37亿。

在分析政策情景和最佳情景时，我们采用了近年来关于养老保险范围扩大的相同数据，但用中国政府在2020年实现城镇与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达到80%的目标替代基准的覆盖范围。无论在政策情景还是最佳情景下，养老保险总覆盖率都基本上要达到100%，做到应保尽保。因此，对这两种情景下的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分析的结果是相同的，即2025年前整体参保率可达85%。这也意味着，届时有95%的城镇居民和80%的农村居民与农民工都可享受养老保险。同时也说明，在政策情景和最佳情景下，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将从现在的2.89亿增加到2025年的7.33亿，新增参保人员4.44亿，比基准多2.07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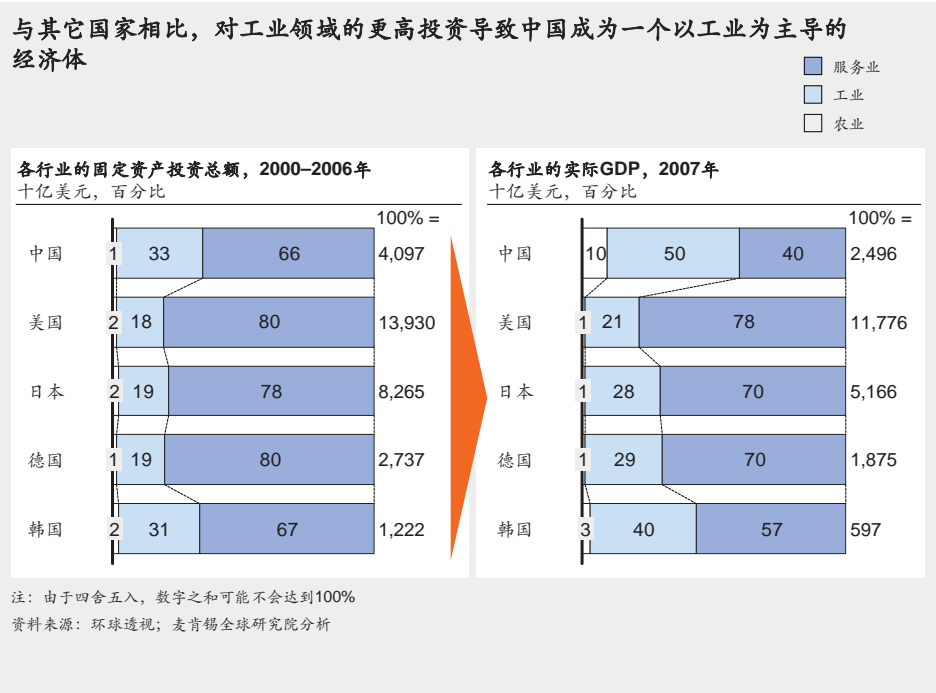
### 对参保职工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参加养老保险人员的可支配收入会出现一次性下降。在对此进行分析时，考查了两类情况。在基准情景和政策情景下，我们对参保人员的收入影响分析结果是每位参保职工的可支配收入会一次性降低8.3%（下文将阐述计算依据）。这与当前的实际情况最为接近。在最佳情景中，我们假设政府会试图最大限度地减少参保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并且会设法使企业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最佳情景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可支配收入下降幅度较小，只有3.7%。无论是否在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内，基准收入增长率都适用于所有职工，这是因为没有依据可以证明参保人员的收入增长会更快或者更慢。

在估算这两类情况下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扩大对收入的影响时，参保人员必须交纳的费用经过一些调整后直接从收入中扣除，具体方法详见下段说明。在基准情景和政策情景中，基本养老保险费由企业和职工平均分摊。因此，企业的成本稍有上升，职工收入也略低于其“潜在”水平。在最佳情景中，企业承担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全部成本，从而使其成本增加或投资减少（图A1）。

养老保险费的总成本应该相当于企业和职工缴费之和（缴费比例分别是该职工缴费工资的20%和8%），但是总成本占收入的比例实际上要低的多。这主要是由三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工资收入平均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76%。第二，根据2005年世界银行对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一份报告，缴费工资仅为平均工资的87%。第三，征缴制度效率低下，实际收取的保费只有应缴金额的70%。结合这三个因素，得出的结果是，在基准和政策情景中，职工养老保险费总成本是可支配收入的8.3%；在最佳情景中，这一比例是3.7%（同时也大致可以说明需要承担最大份额养老保险费缴纳成本的是企业，而不是职工）。

图A1



对储蓄率的影响

为了计算养老保险范围扩大对储蓄的影响，我们使用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09年4月中国城市消费者储蓄行为调查报告中的数据，对两类人群的储蓄行为如何发生改变做出假设。这两类人群包括在任何情景下都可享受养老保险的职工（可以是已参保人员，也可以是在基准情景下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扩大后可被纳入参保范围的人员）和只有在政策或最佳情景下才可被纳入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职工。对于那些在任何情景下都不能享受养老保险的职工，我们假设其家庭储蓄率保持在基准水平。在得出各类人群家庭储蓄率后，将其加总，进而计算2025年家庭储蓄率的整体变化，籍此评估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扩大对于消费的影响。

调查显示，有养老保险的消费者存款金额占可支配收入的18%左右，没有养老保险的消费者的存款金额大约占可支配收入的25%。当然，其它一些因素（如医疗保险覆盖率）可能与养老保险覆盖率有联系，并且造成了消费者储蓄行为的差异。不过，在对这些因素的影响进行评估时，我们并未发现养老保险和其它社会保障指标之间在统计上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因此可近似认为因缴纳养老保险费而自愿减少储蓄的部分约等于新增被纳入养老保险体系职工个人储蓄的四分之一（例如在基准情景中未被纳入养老保险体系，但在政策或最佳情景中参与养老保险的职工）。因此，在基准、政策和最佳情景下，我们假设未来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的储蓄率到2025年将下降4.5个百分点（即2025年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17.7%的基准预测的四分之一）。

如前所述, 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扩大对于那些在基准情景中未参保人员的储蓄影响最为明显。同时, 我们认为, 养老保险体系的完善也会对在所有三种情景下都参保人员的储蓄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在基准情景下已参保或即将被纳入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职工), 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会解决养老保险体系所面临的管理和集资问题。因此, 我们相应地也降低了这些职工的储蓄水平。在最佳情景下, 政府会对养老保险体系建设采取最积极的政策措施, 我们假设参保群体的储蓄将降低15%, 虽然小于新增被纳入养老保险范围的职工25%的储蓄减少幅度, 但降幅也不算低。在政策情景中, 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对储蓄的影响就更有限了, 只会使储蓄下降5%。通过计算各个群体的新储蓄率之和, 我们得到了总体家庭储蓄率(表11)。

表11: 完善养老保险体系: 宏观经济影响				
指标	单位	基准情景	到2025年之前, 仅靠这一政策所能产生的影响	
			政策情景	最佳情景
国内生产总值	10万亿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78, 508	77, 703 (-1.0)	78, 231 (-0.4)
个人消费	10万亿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30, 343	29, 838 (-1.7)	30, 655 (+1.0)
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	%	38.7	38.5 (-0.2)	39.2(0.5)
人均消费	千元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21.1	20.7(-1.7)	21.3(+1.0)



## 开展结构性改革, 增加家庭收入

### 副文A1:结构性政策研究方法说明

尽管技术附录详细阐述了我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但有一点必须指出,评估这类政策影响的方法与用于其它两类政策分析的方法不同。对于旨在鼓励个人消费和改善社保体系的政策,我们用自下而上的方法,评估特定的政策目标实现后对GDP各组成部分的影响。但在分析结构性变化时,我们并不会从具体的政策建议入手。相反,我们将历史增长的模式和预测阶段投资与就业的变化结合在一起,更宏观地分析如果政府按照本章中设定的各种政策目标进行后中国经济的可能走向(包括就业、生产力水平、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资本存量等)。

基于对2025年中国经济的假设,我们进而对各种情景下GDP、投资、个人收入、消费和净出口进行了预测。总之,本部分的重点不在预测这些政策实施后2025年的中国经济的具体走向,而是分析如果中国将产业发展的重点放在服务业上,宏观经济各组成部分(包括投资、消费和个人收入)将会如何偏离基准预测。

在评价投资性收入增长所产生的影响时,我们采用了类似的方式。没有单独考虑某一项政策的增量影响,而是使用自上而下的方法,首先对家庭收入中投资性收入所占份额进行假设,然后以此为基础计算对于总收入和消费的潜在影响,并且进行敏感度分析,以预测股息、利息和其它类型的投资性收入在普通家庭中收入来源中所占份额提高后对于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影响。

尽管没有估算单一政策的增量影响,但非常明确的一点是,中国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切实的改革。这将促使中国向以服务业为导向的经济模式转变,并且有助于增加家庭的投资性收入。这些改革包括金融市场开放、取消对工业投资的补贴和税收激励措施,以及鼓励中小企业投资与发展。

### 2025年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份额

能够影响中国投资模式的政策调整可使特定行业的增长加快或者放慢。为了评估潜在成果,我们设定了2025年使中国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份额达到政策和最佳情景目标所需的发展路径。现在,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是40%。在基准情景下,到2025年前该行业对GDP的贡献只会小幅增加到43%。虽然有3个百分点的增长,但这一比例仍然大大落后于当前其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水平(如,2007年,美国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是78%,日本和德国是70%,韩国是56%)。由于政府已经把提高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例做为十一五规划的目标(2005-2010年),我们相信如果政府能够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中国在2025年前很有可能较大地提高服务业的份额。然而,中国政府目前所采取的刺激措施(这些措施的影响可能是

短期的) 和产业政策来看, 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形势下中国政府重点扶持的对象是工业, 而非服务业。

我们不想猜测产业扶持向服务业倾斜会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GDP的增长, 因而假设GDP在政策和最佳情景下与基准情景比较接近。这样一来, 使服务业增长加快的经济变化同时会使工业的增长放缓。在政策和最佳情景下, 我们假设农业增长保持在基准水平。我们要考虑的是, 在政策和最佳情景中, 如果到2025年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份额分别达到49%和56%, 这将对消费占比和宏观经济带来何种影响。

政策情景分析是以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就服务业所设定的目标为基础进行的, 即到2010年前将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提高3个百分点。基准预测显示, 以中国目前状态这个目标不大可能实现, 到2010年前服务业的份额会保持在40%左右。如果政府要在第十二、十三和十四个五年规划中达到相似的目标, 那么到2025年中国的服务业的占比应达到49%。为了评估中国经济更大幅度地向服务业倾斜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在最佳情景中把服务业份额设定为56%。尽管这种情景下对消费占比影响所得到的结论与其他情景有所不同, (因为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 但是最佳情景的研究结果与世界银行Bert Hofman和Louis Kuijs在2007年10月所提出的见解非常一致, 即2025年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份额可能达到54-55%。这与韩国当前的水平也很相似, 具有可比性。<sup>24</sup>

## 对就业、投资和生产率的影响

为了对中国总体GDP和服务业、工业与农业占GDP的比重进行预测, 我们运用了标准柯布—道格拉斯分解分析法了解资本存量、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经济增长模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的分析首先假设中国能够在2025年前使服务业的比重达到49%或56%, 同时无须进行任何使经济总体增速上升或下降的大幅调整, 在这种情形下进一步研究各产业的总体就业、投资和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变化。虽然在这类分析中, 中国要增加服务业的比重有多条道路可供选择, 但是我们选择了两种相对符合中国实际的方案。总而言之, 包含基准预测在内共有三种模式。<sup>25</sup>

### ■ 就业——更多的劳动力涌入服务业

随着中国农业部门生产率逐步提高, 更多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从土地上释放出来。富余劳动力必须向工业或服务业转移。过去, 这些低技能劳工更多地流向制造业和建筑业。但是, 如果中国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 劳动力更多地涌入服务型产业, 从而会降低其它行业的总体就业增长。

24 Bert Hofman和Louis Kuijs, 《重新调整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 于2007年10月19日在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举行的中国汇率政策研讨会上的发言。

25 在此所用的基准预测包括总体和按行业划分的GDP、就业、资本存量数据。行业GDP和就业数据来自环球透视2009年5月的预测, 总体就业和资本存量数据源自2009年5月的牛津经济中心预测。

## ■ 投资——更多的投资投向服务业

在报告正文中曾经提到过,多种证据表明,中国经济结构的局部扭曲导致对工业的过度投资。调整经济结构的扭曲可转变投资模式,提高服务业资本存量的增长率,降低工业资本存量的增速。<sup>26</sup>

## ■ 生产率——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快于服务业

近几年,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减缓,反应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增长主要靠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释放出的富余劳动力)和资本(工业企业近年来利润增长很快,并将利润大多用于再投资以扩大产能)这两大要素的大幅增长来拉动。<sup>27</sup>如果就业如前所述逐渐向服务业转移,工业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就必须迅速提高自己的生产率(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工业生产中的劳动力技能和技术含量都将逐步提升)。当然,由于吸收了大量低技能工人,服务业的生产率提高速度可能较慢。

## 对收入、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影响

一旦得到了总体就业情况数据,我们就可以使用三大产业的历史工资水平差距和生产率水平来计算2025年各产业的总工资(进一步对收入进行预测)。对于农业和工业,我们所做的假设是这两大产业的工资增长将不同于基准预测值,而是和劳动生产率保持一致:如果劳动生产率增速高于基准,工资上涨的速度就会加快;如果劳动生产率增速低于基准值,工资上涨的速度就会放缓。对于服务业,我们认为中国的服务业还有实现更大规模经济的空间。因此,我们假设工资提高的速度在初期和服务业GDP增速保持一致,然后在中后期逐渐过渡到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保持一致。由于采用了静态分析法,我们将基准的个人储蓄率带入收入,以计算这种情景下经济中新个人消费水平。

与基准情景相比,个人消费在政策情景和最佳情景中会大幅上升(政策情景下的个人消费占GDP比重为9.6%;最佳情景为17.6%),因此GDP的其它组成要素所占份额则会下降。我们排除了对政府支出的影响,假设大多数政策调整对政府支出基本或者完全没有影响。所以,GDP其它组成要素所占比例净减少会表现为总投资低于基准值(随着金融系统能够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本,投资增长将更有效率),以及国内消费扩大所带来的净出口的下降(表12与表13)。

26 对于要达到某资本存量水平所需投资额的估算结果会随折旧率和贴现率的假设发生改变。但是,由于使用资本存量数据能让我们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所以我们将资本存量用于主要分析。通过研究各个行业投资与GDP的历史联系,了解要达到这一GDP增长速度所需投资,我们推算出了相应的投资水平。

27 郑京海、Arne Bigsten、胡鞍钢著,《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从生产率视角来看》,哥德堡大学经济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2006年11月28日

表12: 将投资向服务业转移: 宏观经济影响				
指标	单位	基准情景	到2025年之前, 仅靠这一政策所能产生的影响	
			政策情景	最佳情景
国内生产总值	10万亿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	78, 508	79, 967(+1.9)	81, 034(+3.2)
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	%	51	45	38
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	%	43	49	56
个人消费	10万亿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	30, 343	33, 265(+9.6)	35, 677(+17.6)
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	%	38.7	41.5(+2.8)	43.5(+4.8)
平均每户家庭的可支配收入	千元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	70.8	77.6(+9.6)	83.3(+17.6)
人均消费	千元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	21.1	23.1(+9.6)	24.5(+17.6)

表13: 将投资向服务业转移: 对GDP供应指标的影响				
指标	单位	基准情景	到2025年之前, 仅靠这一政策所能产生的影响	
			政策情景	最佳情景
就业总人数	百万人	863	872	909
农业就业人数	百万人	111	110	110
工业就业人数	百万人	438	379	267
服务业就业人数	百万人	314	383	532
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2008—2025年复合年增长率, %	3.1	3.3	3.9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2008—2025年复合年增长率, %	4.8	4.6	4.1
资本存量	万亿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162.4	154.0	146.4
工业资本存量	万亿元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82.9	67.1	48.3
服务业资本存量	万亿元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62.6	77.7	88.3



提高家庭收入中的投资性收入

根据2003年以来可以获得的数据,中国家庭的投资性收入一直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总数的1-2%。如果我们把基准值设为1.7%,并且假设来自资本要素的收入增长不会挤占其它类型的收入增长(表14)。另外,我们还假设在政策情景下,中国家庭的收入中有3.4%来自于投资,到2025年复合年增长率是9%;在最佳情景下,投资类家庭收入占5.1%,到2025年复合年增长率是13%。根据这一假设所进行的预测显示平均家庭收入将增长1.7%-3.4%(表15)。

表14: 投资收入假设			
指标	基准情景	政策情景 (到2025 年之前)	最佳情景 (到2025 年之前)
投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	1.7	3.4	5.1
平均每户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千元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70.8	72.0	73.2

图15: 提高投资类家庭收入: 宏观经济影响				
指标	单位	基准情景	到2025年之前, 仅靠 这一政策所能产生的 影响	
			政策情景	最佳情景
国内生产总值	10万亿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	78, 508	78, 408 (-0.1)	78, 307 (-0.3)
个人消费	10万亿人民币, 按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	30, 343	30, 858 (+1.7)	31, 372 (+3.4)
个人消费占GDP 的比重	%	38.7	39.4 (+0.7)	39.9 (+1.2)
投资收入占家庭 收入的比重	%	1.7	3.4 (+1.7)	5.1 (+3.4)
平均每户家庭的 可支配收入	千元人民币, 按 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	70.8	72.0 (+1.7)	73.2 (+3.4)
人均消费	千元人民币, 按 2000年实际人民币值计算 (%)	21.1	21.5 (+1.7)	21.8 (+3.4)

为了确定这些趋势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我们使用中国的个人储蓄率基准值(到2025年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16.7%)来计算边际消费倾向,并且将其用于所有的新增收入以估算由此产生的增量消费。我们假设新增收入应从投资基准值中扣除(因为新增收入来自公司的留存利润)。



## 参考文献

Jonathan Anderson著,《破解中国的再平衡谜题》,《财经与发展》,2007年9月,第44卷,第3期

Jahangir Aziz、Steven Dunaway著,《中国再平衡之举措》,《财经与发展》,2007年9月,第44卷,第3期

Jahangir Aziz、Li Cui著,《中国低消费之解析: 被忽视的家庭收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报告,2007年7月,第07/181号

白重恩、钱震杰著,《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 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学季刊》,2009年,第2期

Olivier Blanchard、Francesco Giavazzi著,《重新平衡的中国经济增长: 一种三管齐下的解决方案》,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工作报告,2005年11月25日,第05-32号 (<http://ssrn.com/abstract=862524>)

蔡昉、Albert Park著,《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化》,密歇根大学经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7年4月

Marcos Chamon、Eswar Prasad著,《中国城市家庭储蓄率为何增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8年6月,第08/145号

陈少华、Martin Ravallion著,《中国比我们设想的更贫困,但减贫依旧成就非凡》,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工作报告,2008年5月,第4621号

Chou Shin-Yi、Jin-Tan Liu著、James K. Hammitt著,《国家健康保险和预防性储蓄: 台湾例证》,《公共经济学杂志》,2003年,第87期(9月9-10日),第1873—94页

何建武、高路易(Louis Kuijs)著,《重新平衡中国的经济—建立一揽子政策模型》,世界银行中国工作报告,2007年9月,第7号

Bert Hofman和Louis Kuijs,《重新调整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在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举行的中国汇率政策研讨会上的发言,2007年10月19日

张军著,《投资、投资效率和中国经济增长》,《亚洲经济期刊》,2003年,第14期,第713—34页 ([www.sciencedirect.com](http://www.sciencedirect.com))

刘国恩、Brian Nolan、陈文著,《中国城镇医疗保险与筹资》,北京大学、北

卡莱罗纳大学、爱尔兰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004年7月27日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遏制全球能源需求的增长: 提高能效机遇》, 2007年5月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从“中国制造”到“中国销售”: 中国城市消费者的崛起》, 2006年11月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迎接中国十亿城市大军》, 2009年2月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令中国资本运转: 金融体制改革的价值》, 2006年5月

孟庆跃著,《中国卫生服务体系组织机构改革评价研究》, 山东大学, 世界银行中国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研究背景论文, 2005年3月

冼懿敏著,《中国: 养老金负债和养老保险的改革选择》, 世界银行工作报告, 2005年5月, 第2005-1号

《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问题和建议》, 中国经济研究和咨询项目, 2005年1月27日

Wang Limin、Sarah Bales、张振忠著,《中国社会保障方案和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评论》, 世界银行草拟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EAPREGTOPHEANUT/Resources/502734-1129734318233/safetynetandhealth\\_correctauthor.pdf](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EAPREGTOPHEANUT/Resources/502734-1129734318233/safetynetandhealth_correctauthor.pdf))

Wang Yan、Yao Yudong著,《1952-199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 人力资本积累》,《中国经济评论》, 2002年7月, 第14期, 第32-52页 ([www.sciencedirect.com](http://www.sciencedirect.com))

世界银行,《中国卫生领域的公共支出和政府的作用》, 简报, 2005年5月, 第5号

郑京海、Arne Bigsten、胡鞍钢著,《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 ——从生产率视角来看》, 哥德堡大学经济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 2006年11月28日



